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4月30日第8期 总第154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54期

北京师范大学文革研究专辑（二）

目 录

【专 稿】

丛立新 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

【评 论】

安希孟 董连猛其人其事其诗

【述 往】

岳瑞民 1967年夏天揪“军内一小撮”

林贤光 我参与了北师大的“九七事件”

赵惠中 夜访金永龄

【文 摘】

张海鹏 文革初期“三孔”遭遇空前劫难

【资 料】

韦 陀 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1966.6—12）（征求意见稿）

【读者来信】

1. 岳瑞民读赵惠中文的感想
2. 赵惠中对胡宗式、陈闯创批评的回应
3. 宋翔雁、刘昭明来信
4. 庄菁瑞有感
5. 黄孝华赐函
6. 薛雪莱询问为什么看不到工宣队、军宣队的回忆或访谈
7. 孙沛东谈王爱和与无名画社

【本刊声明】

【专稿】

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

丛立新¹

50年前的那场灾难，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整整十年间，在北京师范大学，如同那时中国大陆上的诸多学校、机关、工厂、乡村一样，许多人死于非命。今天，询问北师大校园中的各色人等，从青年学生到中年教师，大多数对那些非正常死亡不甚了解，甚至闻所未闻。当然，仍然有许多人在以各种方式缅怀和纪念着逝者，因为，他们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非正常死亡也是不应该被淹没的。

本文尝试建立一份备忘录，尽管竭尽所能并且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帮助，所包括的人数可能并不完全；一些逝者的情况十分简单，更可能存在不准确之处。以上种种实在是不得已，就此向所有相关人士致以歉意。如果有人愿意提供补充，感激不尽。

一、非正常死亡者

以下逝者没有明显的同质性，他们的出身背景、个人经历、年龄和学业各不相同，在十年中的处境也各不相同甚至极为悬殊。其中有知名学者，普通教师，年轻学生，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唯一之处就在于，他们均是在十年动乱期间“非正常死亡”。²

教育系

¹ 本文作者丛立新（女），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现为教育学部），退休前为该系教授。

² 本文收录的非正常死亡，标准有二：一其死亡是文革迫害之结果，二死亡时间在文革十年之内，文革期间因受迫害而自杀获救者，本文未予收录。谨此说明。

蔡钦山 （生年不详—1966）

1966年6月16日，北师大教育系二年级学生的辅导员（当时班主任称为辅导员）蔡钦山，带领在山西沁县参加四清运动的学生返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回京第二天，6月17日，留在北京因而较早参加运动的四年级学生拉了一些二年级的同学开批斗会，蔡钦山被带上高帽子，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执行者”，站在凳子上接受批斗。造反派们还在宿舍的门上装了一块黑板，令他在进出时必须低头弯腰，称之为“钻狗洞”。当天晚上，蔡钦山在学生宿舍西西楼二层的寝室内自缢身亡。用一根绳子系在暖气管上，然后从窗口向外跃下，成为十年动乱期间北师大校园内第一个自杀者。而他的这种死亡方式，后来一再成为其他逝者的选择。据说，从被批斗到死亡，他没有说过一句话。蔡钦山死亡后，工作组在报告中说：蔡钦山的自杀是叛变行为。

蔡钦山，福建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留校任教。蔡钦山是共产党员，出身好，家里是三代贫雇农，思想正统，一直积极要求进步，生活上亦极为艰苦朴素，是学雷锋标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曾经被誉为焦裕禄式的好党员。

王文宁（女） （生年不详—1966）

1966年9月某日，教育系女教师王文宁从家中一一工四楼四层跳楼身亡。

文革初期，王文宁正在山西临汾分校。文革开始后，分校开始出现大字报在临汾分党委安排下，王文宁去抄学生的大字报。不久后，这一行为便令她落下“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遭受冲击。6月15日回到北京，当晚便被揪出来在全系大会上批斗。她是教育系最早被整的人之一，此后大小批斗接连不断。

王文宁于1951年毕业于北师大前教育专业，1955年到苏联莫斯科师范学院留学。回来后在北师大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任教。1965年，担任教育系党总支委员，负责统战工作。在同事们眼中，王文宁为人忠厚，温文尔雅，是一位淑女型知识女性。

邱椿(1897—1966)

1966年9月，邱椿头戴高帽，先在校园内游斗，随后被押到北师大学生宿舍西西楼前，在全校规模的大会上接受批判。其间，被喝令站到叠放在讲台桌上的凳子上。年近七旬、患有心脏病的邱椿在红卫兵拉扯下，颤悠悠登上“审判台”，批斗会尚未结束，邱先生便从凳子上一头栽下。邱先生摔下来后，曾经向造反派要求服药，遭到斥责：“不要装死”。参加批斗的学生亦大声呼喊：“快站起来，不要装死！”会后，躺在地上的邱先生长时间无人过问。最后，拉到校医院，也没有人敢救，终于不治身亡，那一年，他69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邱椿很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屡遭迫害。

邱椿，号大年，江西省宁都县石上镇莲塘村人。1920年7月毕业于清华，在北京参加了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毕业当年赴美，先后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获得教育学学士、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1月留学德慕尼黑大学，研究教育学。1925年10月，邱椿归国后，先后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育教授。期间，于1927年前后与姜琦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1933年10月，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以教授名义出国，赴欧美、苏联考察。1934年秋至1935年秋，仍以教授名义留学德国柏林大学，专心研究教育哲学。1944年11月，邱椿赴美国讲学，任匹兹堡大学教授，主讲中国教育。

1946年春归国后，曾经由青年党推荐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坚辞未就并退出该党。同年夏，国民党政府任命邱椿为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亦坚辞不就并自动脱离国民党。后赴北平，入北京大学任教育系教授，后北京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邱椿也来到北师大，是学校有数的几个二级教授之一。

邱椿一生主要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各大学任教期间，担任的课程主要有：教育哲学、现代教育思潮、西洋教育史、中国教育史、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现代教育学说。邱椿教学效果突出，讲课富吸引力，有人赞为“雄辩滔滔”。每当他上课，座无虚席，教室内外的走道都被旁听者挤得水泄不通。1952年后，由于身体及其它原因，

没有再登上讲台。但仍然经常到校指导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同时，还潜心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到临终前，写出了约80万字的朱熹、陆九渊、杨简、王阳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贽等9位学者的教育思想论著。在他离世近20年后，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古代教育思想论丛》（上、中、下）为名出版。邱椿一生著述甚多，曾有《英国唯心主义者的教育思想》、《中国新教育行政制度之研究》、《西洋教育史》、《教育哲学》等。

邵鹤亭（1902—1966）

1966年9月某日，邵鹤亭教授及夫人的遗体躺在北师大教师宿舍工四楼前，二人身上均裹着毯子，是跳楼自杀。此前，邵先生已经遭到多次批斗，家中多次被抄。在一次批判会后，有人曾经听到邵先生反复低语：义不容辱。有人说，造反派让邵先生给邱椿做“孝子”打幡，性情刚烈的邵先生无法接受。且造反派已经通知他到劳改队去报到，邵先生自杀正是报到日前一天。

邵鹤亭先生1902年生于江苏宜兴。1920年毕业于江苏省立常州中学。曾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1928年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获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常州中学校长、苏州中学校长、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和晏阳乡村建设学院院长。1945年2月，顾毓琇聘邵鹤亭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国立编译馆编纂兼中国教育全书编纂处主任等职。全国解放后，曾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和华北革命大学学习。1950年起，任教育部参事和北师大教授。

主要著作有：《尤莱士思想与革命理论之研究》、《训导原理》、《社会思想与教育》、《孔子的教育思想》（毛礼锐、邵鹤亭合著）、《中国古代教育史》（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主编），主要译著有《为美国反动派服务的杜威教育学》（〔苏〕谢伏金著，陈友松、邵鹤亭翻译）、《教育史》（〔苏〕沙巴也娃著，邵鹤亭、李子卓等译）

邵先生夫人是家庭主妇。

政教系

高尚年（生年不详—1966）

1966年2月22日清晨（一说23日），北师大临汾分校政教系学生，团支部书记高尚年，声称去买烟，路过一口水井，纵身跃入。临汾地区的水井很深，高尚年当即身亡。当他的遗体被从井里捞出来时，有人说：看看死了没有，如果没死还得拉去斗。

运动初起，临汾分校开始出现大字报，党委安排年轻教师和党员学生组成大字报管理小组，负责统计大字报的作者、内容等等。身为党员、团支部书记的高尚年是成员之一。很快，工作组来到分校，表态支持造反派，并且宣布临汾分校有保皇派¹。大字报小组成员自然成了保皇派，成员之一首先遭批斗。高尚年深感压力沉重，精神紧张恐惧，在批斗会后找到被斗者，表示我们错了，是不是要反戈一击，可以写大字报等等。这时，已经知道第二天要召开他的批斗会，而且此时班里已经有针对他的各种人身攻击。高尚年已经失去行动自由，第二天他赴死的路上，还有人跟着。

高尚年，196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是二年级三班学生，表现积极，要求进步，担任班级的团支部书记。

石磐（1916—1966）

1966年8月17日傍晚，经历了又一次批斗会的石磐教授回到家中，吃过午饭，换上一身整洁新衣，于下午两点左右登上校园内最高建筑——八层主楼，从南面7层上自己的办公室跳了下去。当时有人目睹，落地后还有呼吸，送到校医院后不治。很快，校园广播响起：“极右分子石磐自绝于人民”云云。这是文革期间发生在北师大校园内的第一例教授自杀。石磐教授自杀的第二天，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

¹据一些亲历者回忆，临汾分校的工作组与当时派往北京高校的工作组不太一样，一开始便表态支持造反派。

兵的日子。

文革开始后，石磐教授饱受折磨。有人目睹，某次红卫兵拉他去批斗，石磐拼力抵抗，被拖在地上走，衣服磨破，身上鲜血淋漓。即令如此，他在被批斗时仍然态度强硬：“我是马克思主义的”。

石磐，安徽巢县人。因父亲当过河北隆平县知县，从小到隆平读书，后移居天津、北京，1931年返回家乡读中学。虽然年少，但思想进步，因反对当局的言行遭学校开除。1934年父亲病故后，到合肥、济南、上海等地谋职，遭遇坎坷。在此期间自学文学、社会科学和日语、俄语、世界语。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石磐奔赴延安，同年加入共产党。先后在边区保卫处、中央干教部、延安行政学院和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党的保卫工作和干部培训及理论研究。石磐热心经典，又自学德语，能够阅读并翻译马列原著。

1948—1952，石磐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担任过学校教育处副处长。1950年，曾经去苏联访问，所见所闻使他对斯大林模式产生怀疑，回国后于1952年退党，随之被调离宣传部，到教育部做巡视员。1953年调来北师大政教系任教授，兼任哲学教研室主任，是北师大政教系建立初期四位著名教授之一（其他三位教授是陶大镛、马特和王真先生），并且同陶大镛教授一起，率先在政教系招收研究生。反右运动后被打成极右分子。1956年，要求重新入党：“尽管我认为这个党的路线政策根本错了，那么我也应该留在党内，作一个党内反对派。”1958年初，他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1961年解除“劳教”回校工作，被分配在外国问题研究所。住在一间极小的屋内，房内堆满了书，余外只有一张床。

石磐治学严谨，教学敬业，在培养研究生时风格独特。他要求学生有宽厚的学术基础，为此请来北大的朱谦之和任继愈，人大的石峻，为弟子开设“中国哲学史研究”；请来北师大物理系赵亮坚，开设“大学普通物理”；请来北大任华，开设“西方哲学史研究”；请来于光远，与学生座谈如何学习和研究哲学……。督促学生掌握好外语，鼓励他们直接

阅读西方哲学原著。他告诉学生，斯大林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肯定苏共二十大突破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石成为“右派”的经历与众不同。在反右运动开展了一年之后，他以向党交心的形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其中对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做出全盘的反思与批评。

第一，石磐认为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变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是新的特权等级社会，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工农群众没有当家作主。他说：“苏联工农的生活比十月革命以后改善得并不大，但特权等级的生活却提得太高了。我1950年到苏联去了一次，看到很多工人生活很苦，农民就更苦了。”

第二，石磐认为中共党内没有民主，毛泽东搞的是个人崇拜。“我认为喊党万岁是可以的，但喊个人万岁是不应当的。”

第三，石磐反对过度地搞工业国防建设，反对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主张大力改善人民生活。他认为工业化、农业合作化的建设搞得太快了。中国经过了多年的战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共产党进城后就应当首先考虑改善人民的生活。现在是特权等级的生活提得太高，工农生活改善得太慢。

第四，石磐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主要应通过会议斗争，现在不必打破旧的国家机器。

石磐教授所言所行，在当时石破天惊，至今依然惊世骇俗。无论是否同意他的具体看法，都会承认他思想当中的深刻洞见及其价值，承认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

朱启贤（1911—1968）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北师大准备在校园里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游斗活动，被游斗的对象共有100多人。政教系教授朱启贤在活动前夕得到通知，自己也在其列，于

是服安眠药自杀。

1911年，朱启贤出生于山东省单县孟寨乡。早年就读于山东省立六中，1927年加入国民党。1929年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就读，在学期间，他与后来同为北师大教授的何兹全等人，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组织“玛宁社”（因为大家彼此见面问好“morning（玛宁）”）。成员们志同道合，思想倾向接近，关心社会和教育，认同民主、温和改良，部分接受社会主义。朱启贤深感，乡村小学教师的知识结构及知识的丰富程度关乎千百万儿童，关乎中华民族的未来，于是在1934年，以他为首，玛宁社创办了《教育短波》杂志，这是一份以乡村小学教师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形式活泼，信息丰富，受到广大教师欢迎，得到了陶行知等人的支持，钱玄同为杂志写刊头，陈立夫为杂志提供资助。《教育短波》发行量一度高达5万份，而当时上海的《大公报》也只是一万多份，可说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多的杂志之一。

1935年任山东省第三民众辅导区主任。他积极主张抗日，任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1938年赴延安出席教育座谈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40年任四川科学教育馆员兼成都华西大学教授，并主编《中国教育》，撰写并发表了一些进步文章，出版专著《文学、哲学与玄学》。1942年5月再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再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之后，他努力为抗日民主教育事业奔走呼号，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战时教育改造计划》等文章多篇。

由于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受国民党迫害，遂于1943年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授。留美期间，朱启贤仍然十分活跃，是当时留美学者中的重要人物。他受中国民盟总部的委托，组织民盟美国支部，开展反蒋活动。1945年，董必武代表中国解放区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朱启贤担任翻译、联络和保卫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启贤欢欣鼓舞，在美国组织庆祝会，同时公开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样的行为令他受到美国政府的种种限制并被处以大量罚金，最终在1950年被驱逐出境。随即，朱启贤经香港回到新中国，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

和慰问。

回国后，据说是由董必武介绍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先在教育系，后来转到政教系工作。1957年打成右派，

朱启贤性情张扬，倔强刚烈，成为右派后拒绝认错，拒绝写检查，因此后来不少人得以摘掉帽子，他却始终是右派。

马特（1910—1968）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马特教授被隔离审查。1968年某日，专案组找马特教授谈话，之后他从北师大主楼五层跳楼身亡。

马特教授“罪名”甚多。抗日战争时期，20多岁的马特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做政治工作。反右时期，他被打成右派并且被清除出党。这些都使得马特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无法幸免。

马特，1910年出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学家。马特曾经在香港达德书院任教¹。后来到北师大，1949年在历史系任教，1953年政教系成立后调入该系。1956年，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教研室成立逻辑教学小组，马特为组长。1958年，逻辑教研室正式建立，马特担任教研室主任，于1959年在校内招收研究生。这些，在我国和北师大的逻辑学教学与研究中都是重要贡献。50年代时，马特与复旦大学马兵、河南大学马佩并称“逻辑三马”。著有《论逻辑思维的初步规律》、《形式逻辑中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逻辑问题》等。《论逻辑思维的初步规律》曾经得到毛泽东的称赞，说写得好，咱们共产党人写不出来。中国讲逻辑学的人中间，他讲得最好。

马特教授特立独行。1956年，中央组织部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提高教授党员的比例，马特教授躬逢其盛。在入党时，他曾提出入党后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作为条件。据说当时校党委并不了解这个情况，以致基层支部为凑数而将其拉入党内。1957年鸣放时，马特发

¹香港达德学院是19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建立的大专院校，由周恩来和董必武指导创办。

表同情右派言论，主张教授治校，很快即被清除出党，打成右派。

中文系

卢志恒（生年不详—1966）

1966年6月23（或24）日¹，山西临汾北京师范大学分校附近的一个农民，在学校附近的崖儿沟七一渠内，发现了一具尸体，经辨认，是中文系教师卢志恒。

文革初起，临汾分校内开始出现大字报，分校党委遂安排教师卢志恒与其它两个学生党员组成大字报管理小组，负责抄写、统计大字报。6月22日，工作组进驻临汾分校，表态支持造反派，于是卢志恒等人立刻成为“保皇派”，背负打压革命群众等等罪名。大字报管理小组的其它两个成员，一个已经被批斗，另一个受到各种冲击并即将召开批斗会。挨斗的学生曾经找他倾诉，卢志恒十分沉默，但仍然开导对方：“不要怕，咱们一起犯了错误，咱们一起承担，你是学生身份，我是教师，责任更大。”随后，卢志恒眼见造反派的种种动态，并且被他的学生强迫下跪，于是走上不归路。发现卢志恒失踪后，还有人说他逃跑了。

卢志恒是东北人，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于文艺理论教研室。中等身材，带深度近视眼镜，专业优秀，能言善辩，才气横溢。曾经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论文；还在学生时期，便参与主编了《中国戏剧史》，其显露的才华给教师们留下深刻印象。1966年2月，北师大大部分文科系的教师和学生前赴山西临汾分校半农半读，计划半年时间。卢志恒为中文系带队教师之一，是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同时担任学生辅导员（班主任）。

¹ 据亲历者回忆，卢志恒自杀是在高尚年投井次日，即发现高尚年尸体同日卢志恒失踪，第二天当地农民发现他的尸体。

刘盼遂（1896—1966），夫人梁秋色（生年不详—1966）

1966年8月28日，北京市西单一所小院子里，来了附近一些中小学的红卫兵，住在院子里的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红卫兵在褥子下搜出一张几百块钱的银行存折，认为必定还会有金子，于是开始殴打老夫妇，逼问金子埋在何处。因为交不出金子，遭受毒打，在烈日下罚跪，并且被捆绑在院子里，不准回屋，不准吃饭。红卫兵在院子里挖地三尺，一无所获。一边挖，一边继续殴打辱骂两位老人。几天后，梁秋色先死去。刘盼遂目睹妻子死去，极为悲伤，一头扎进水缸，被红卫兵发现后拖出来继续殴打，很快致死。在刘老被虐期间，他的儿女曾经到师大哭诉求救，请求“营救”父母，没有得到当时的运动领导者们的回应。关于刘盼遂之死的另一个版本是，红卫兵将其头部按入水缸溺死。据说，刘盼遂死后，中央文革派人将其藏书中的珍贵明版书等拿走。

刘盼遂，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名铭志，字盼遂。1896年出生，是河南省信阳淮滨县芦集乡刘套楼村人。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毕业后曾担任山东第二女子师范、曲阜第二师范教员。

1925年，刚刚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首次招生，通过考试录取学生30名，刘盼遂名列第一。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大师。1928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河南中州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自1946年起，开始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当时称北平师范学院）教授。

刘盼遂先生一生从事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在经学、小学、史学、文学、钟鼎、甲骨、校勘、目录等方面功力深厚，卓有建树。尤精小学，即音韵、文字、训诂等。

在北师大中文系，刘盼遂是全系的骄傲。博闻强记，学问精深，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不论什么难题，不论是谁提出，他都能即时应对，论证确凿，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令他被尊为活字典。当年的学生回忆，刘先生讲课不掉书袋，不赶时髦，相当通俗、浅显。解诗的话并不多，说得你明白了就不再多说一句。讲典故也是通俗化了的，就像跟你聊天一般，深受学生欢迎。在春秋假日，他还常带学生去野外郊游。

刘盼遂一生著述甚多。著有《文字音韵学论丛》、《段王学五种》、《论衡集解》、《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王石臞先生年谱附伯仲先生年谱》、《段玉裁先生年谱》、《经韵楼集补编》。他还著有《〈论衡〉注删要》、《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论衡集解》、《后汉书校笺》、《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世说新语校笺”叙》、《“世说新语校笺”凡例》、《说文师说》、《中国语法复词中偏义例续举》、《反切不始于孙叔然辩》、《黄氏古音二十八部商兑》、《甲骨文殷商庙制徵》、《由周迄清父子之伦未全确定论》、《赤子解》、《中华人种西来新证》、《齐州即中国解》、《义山锦瑟诗定诂》、《“永乐大典”漫谈》等论文。还曾与郭预衡共同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学术成果影响广泛，如《论衡集解》便被叶圣陶先生赞为“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

刘先生身材不高，体格清瘦。经常身着中式便服，旧而干净，裤子是老式宽腰系布带的，脚上是自家做的圆口鞋。样子普通得像个农村的小老头，小胡同里退休居闲的好外公，全无知名学者、大学教授的样子。他一生淡泊名利，很少社交活动，从不在背后随便品评他人。他在清华的老同学谢国桢曾善意地劝他多参加些活动，他的回答十分有趣：“谢多情，刘寡欲！”

1966年，在农村改造的老友谢国桢得到刘盼遂死讯，作诗悼曰：“安命何由观物化？梁园小聚转成空；我来君家君已逝，褒信郊原听晚风。”1981年，王力写诗悼念刘盼遂：“博学鸿词属老成，醇儒应与世无争。孱躯底事遭鞭挞？水瓮埋头竟丧生！”

夫人梁秋色是家庭主妇。

叶苍岑夫人（生年不详—1966）

1966年夏天，居住在西单武功街师大宿舍的北师大中文系中教授叶苍岑及夫人，遭到前来造反者棍棒的殴打，夫人被活活打死。

张瑞棣（生年不详—1966）

1966年12月17日，北师大中文系学生张瑞棣从主楼8层楼梯口坠楼身亡。

张瑞棣，1963年从北京五中考入北师大中文系。在学期间，表现积极，热爱党和祖国，团结同学，学习成绩优秀。他的写作能力很强，文革中与大多数同学一样参加运动。据当时及后来了解，他没有任何自杀动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行为迹象。有人推测，当时各个群众组织之间已经出现较强派性，也许张的死亡与此有关。

穆木天（1900—1971） 彭慧（1907—1968）

穆木天和彭慧是师大中文系的教授夫妇。穆木天是著名诗人，彭慧是文学家，两人均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夫妇两人自20年代起曾经在国内多所大学任教，向往光明，参与各种进步活动，与左联等组织渊源深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7年，夫妇二人被打成右派，文革更是在劫难逃，遭受种种折磨，先后死于非命。这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夫妇，没有留下一粒骨灰。

1971年10月某日，北师大教二楼的一间小屋内，人们发现了已经离世几天的穆木天教授。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因为什么疾病死的，临终之时是否痛苦……？没有人知道。

穆木天，原名穆敬熙，1900年出生，吉林伊通县靠山镇人。1918年毕业于南开中学。1923年考入日本东京大学攻读法国文学。1926年回国后，曾任中山大学、吉林省立大学、桂林师范学院、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专职和兼职教授。穆木天是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1931年在上海参加左联，并参与成立中国诗歌会，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穆木天是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曾说：“《谭诗》以论题的新颖和见解的精辟成为中国现代诗论史上的重要文献。由于这一论文以及作者当时的其他文字，穆木天也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¹

¹ 《谭诗》指1926年3月正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的穆木天发表在《创造月刊》上的《谭诗——寄郭沫若的一封信》。

1957年，穆木天被划为右派。“文化革命”中，很快被打成“牛鬼蛇神”，因为鲁迅某篇文章“可能”批评了穆木天，更令他陷入灭顶之灾，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他的创造社、左联经历，为他引来种种骇人听闻的罪名。

文革中后期，对穆木天的审查结束。其时，妻子彭慧已经去世，女儿虽然在北京工作，也不能来看他，遂独自度日。每个月，当局发给他生活费。据说，高度近视的穆木天，脖子上挂着脏兮兮的布兜，经常会从北师大向南走到动物园附近的一家广东餐馆，吃一顿中饭，再带一顿晚饭回家。尽管孤独凄凉，穆木天仍然不失童心，外国文学和儿童文学造诣深厚的老人，会买回一些小人书，将拐杖在地上敲得咚咚响，住所附近的孩子们蜂拥过来，穆先生招呼他们：“排好队、排好队！”然后一人发一本。有的时候，会买来那时算是奢侈品的水果糖，散发在比较干净的草地上，孩子们过来抢，穆先生会告诉他们，不能这样抢，要排好队。然后一人发一颗……。

穆木天一生创作甚丰，在上个世纪20年代至被打成右派之前，留下大量作品。诗歌集有《旅心》、《秋日风景画》等，散文集有《平凡集》，曲艺集有《闹东京》、《抗战大鼓词》，还有理论研究成果《怎样学习诗歌》、《儿童文学参考资料编选》、《王尔德童话》等等。同时，穆木天还翻译大量法文的诗歌、文学及其研究作品，包括《法国文学史》、《牧歌交响曲》、《青年烧炭党》、《绝对之探求》、《凯撒·北罗图盛衰史》、《中世纪文艺复兴后期十七世纪西欧文学教学大纲》、《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十一世纪至十七世纪俄罗斯古代文学教学大纲》等等。

1968年7月某日，在又一次斗争会后返回住处的途中，彭慧倒在北师大的操场上。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她被送回到校园角落无人照应的小平房。第二天中午，六十一岁的女作家离开了人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留下一句话。

彭慧，文学家、诗人、翻译家。原名彭涟清，1907年7月，出生于安徽安庆。小学毕业后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就在她入学不久，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担任该校校长，他教育学生破除封建礼教，锻炼体魄，追求真理，彭慧深受其影响。1925年秋，彭涟

清考入女师大后，积极参加各项进步活动。她和同学们一起去听李大钊作报告，听赵世炎讲马列主义课，向萧三学唱国际歌……，1926年，彭慧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彭慧被送往苏联学习，三年后回国，在上海担任党的地下工作，同时发表文学作品。

在左联的工作中，彭慧与穆木天相识相知，结成了终身伴侣。抗战期间，彭慧先后在武汉、云南、广东、桂林等地辗转，并在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彭慧、穆木天和一些进步教授，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建立了民主党派组织，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要求人民民主，开展了各项进步活动，为此多次收到特务的恐吓信。此后回到上海，继续从事进步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1957年，彭慧被打成右派，并且被开除党籍，撤销教授职称和其它各种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慧陷入无休止的批斗、劳改当中，小说手稿全部被抄走。因为彭慧的经历，对她的审讯格外严酷，并且逼迫她写诬陷左联领导人的材料。彭慧的拒绝又为她招致更加残酷的迫害。1968年初，彭慧被勒令迁出原来的住所，住在北师大校园内一间破旧的小平房内，不允许外出，不允许任何人探望。

胡万顺（生年不详—1966）

1970年春节后，胡万顺新婚后返回学校，随即被怀疑为“五一六”分子。6月初，被办“学习班”（隔离审查）。胡万顺思想负担沉重，认为自己冤枉，“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于6月10日中午，趁看守者不备，从主楼六层被隔离处窗口跳下身亡。

1967年前后，社会上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简称“批资联委会”，由部分高校和一些机关单位的群众组成）组织，有高年级同学拉胡万顺参加进去，实际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其它学校有“批资联”成员成为运动清查对象，受此牵连，胡万顺也被审查。

胡万顺，北师大中文系六五级二班学生。西安人，出身好，父母都是陕西师大的工人。他从小便是好学生，担任学生干部，很能干，喜好文艺体育，自尊心强。

历史系

刘启戈（生年不详—1966）

1966年某日，在历史系组织的批斗会上，刘启戈头戴高帽，还被自己学生当众打耳光。回家后即与夫人跳楼自尽。

刘启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精于世界史尤其是世界中世纪史。建国前任教于辅仁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期，辅仁大学历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他讲的西欧封建制度史给许多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刘启戈先生著述甚多，有《西欧封建庄园》、《世界中世纪史》，《中外历史年表》（与翦伯赞等合编）、《戊戌变法》（与翦伯赞等合编），译作有：《世界通史》、《中世纪中期的西欧》等等。

刘启戈夫人为家庭主妇。

尚文廉（生卒年不详）

1970——71年之间的某日，北师大历史系学生尚文廉，从行驶中的火车上坠落身亡。

尚文廉，北师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来自宁夏农村，出身好。是文革初期积极参与运动的造反派，担任历史系革委会负责人。参加了揪斗谭厚兰的“九七事件”，因周恩来及中央文革表态支持谭厚兰，尚文廉与其他一些学生成为批判审查对象。结束隔离审查后，尚文廉回家探亲，遂扒上火车，不慎坠落身亡。据称，尽管审查结束，如尚文廉这样人的政治和经济处境都十分恶劣，估计他是为了省钱才去扒火车的。

王德一（1937—1970）

1970年，处于隔离审查中的历史系助教王德一自缢身亡。事前，他的自杀行为已经被

另外一名被审查者发现并且迅速报告。人们赶过来时，门从里面插上，破门而入后，看到了王德一吊在房间北面窗户上方的暖气管上，已经气绝。有历史系教师赶到校医院报信，医生跑来进行了各种抢救，未果。王德一的隔离室，是文史楼四层原来的历史系资料室。

文革初期，王德一参加了北师大造反组织，后来又作为北师大“井冈山”的代表，参加过设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批资联委会”。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批资联委会的许多成员成为审查对象，王德一在师大也成为“五一六”嫌疑分子。除了与其他审查对象相同的各种批评斗争外，历史系与外语系还专门联合组织批斗王德一的大会，特别要钱瑗坐到前排。

王德一，籍贯山东济宁。1955年9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学时成绩优秀，曾经被评为优等生，1959年7月毕业时留校。王德一仪表出众，才华横溢，不仅会画画，也写得一笔好字。王德一为人谦和，人缘很好，一直担任学生干部，还是学校美工队成员。1968年初，与同年毕业同年留校、同为学校美工组成员的外语系年轻教师、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女儿钱瑗结婚。王德一留校后在历史系任助教，是中国近代史教研组成员。很快就承担了近代史的教学任务，课讲得不错，颇受学生欢迎。做学生和做教师，王德一都是相当突出的人物。

李永祥（生卒年不详）

在结束作为“五一六”分子的隔离审查短短几个月后，历史系学生李永祥因癌症死去。具体时间不详，据多人回忆，在1970至1971年间。

李永祥曾经担任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文革初期，曾经也挨过整挨过批。后来参加了造反派，于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关在外语楼一层。在反复实施、轮流进行的各种逼供信压力下，李永祥极度焦虑，违心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分子。为了能够过关，他曾经趁一次停电时，在厕所等候几位同时被审查者，塞给对方的纸条上写着：“急，请告诉我，怎么参加的五一六。”

李永祥，回民，通州永乐店人。1961年入学，是当时少有的学生党员。年龄比同班同学稍大一两岁。根据同班同学回忆，李永祥对于党和领袖极为忠诚，工作积极热情，学习刻苦努力，坚持原则，群众关系好。为人淳朴热情，直爽友善，乐于助人。

外语系

何万福（1905—1966）

1966年8月13日，在又一次被批斗后，何万福教授在太平湖（一说龙潭湖）投水自尽。尸体被发现后，在衣服口袋中发现纸条，上写“士可杀不可辱”。时年61岁。此前，被红卫兵揪斗，勒令劳改，有人还记得看到他身穿老北京式样小褂，前后四片用扣袷连着，在楼里面打扫厕所。遭此虐待的何万福感觉受到侮辱，当晚未回家，直接沉湖。

何万福是外语系副教授。他并非正规大学出身，是从乐文馆毕业，过去该馆有一些白俄教授俄语。何教授为人忠厚老实，从不惹是生非。据他教过的学生说，他对自己的学生极好，爱护备至，讲课生动活泼，寓教于乐。

胡明（1908—1966）

1966年9月5日，惨遭迫害，不堪侮辱的俄语系教授胡明，从教工宿舍工一楼四层家中跳楼身亡。

胡明，笔名安熙、韶华、芜田、亮之，江西高安县人。幼年就读于高安县第一高等小学，1923年入江西省第十二中学读书，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了1925年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任县委组织委员，并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高安县党部组织部长。1927年南昌起义后，于高安组织农民自卫军与反动武装进行斗争，后作战失败，被通缉。1928年逃亡上海，失掉中共组织关系。

1929年入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预科学习，1931年升入该院国际贸易系，1934年转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次年毕业。在求学期间，曾经担任北平新报副刊编辑，为进步团体做宣传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参加平津流亡学生团体。1938年初至1942年在上海，先后任光明书店特约编辑和培明图书公司编辑，并为生活书店写稿。1943年7月至1945年7月，回江西，在宜春师范学校任教。1945年7月后，又去上海任光华书店编辑，直至新中国成立。在此期间，1947年9月至12月，因从事进步活动曾被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抓捕关押。

1950年，经数学家傅种孙（高安人，时任北京师大教务长，后为北京师大副校长）推荐，胡明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二级教授，兼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陪审员、高等教育部俄文教学编辑部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俄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并为中央马列著作翻译局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校订马列著作。从1953年起任北京师大俄语系主任。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3年摘帽），遂调入资料室。

胡明一生追求进步，笔耕不辍，翻译著述甚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成就突出。早在1936年，他翻译的列昂节夫著《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便已经出版，此后翻译了大量有关著作，包括维特维尔著《资本主义世界地理》，米丁著《新兴哲学体系》，《苏联内战史》，罗逊夫著《最新哲学辞典》，高尔基著《夜店》，傅尔曼诺夫著《三人集》，波利亚可夫著《敌后》，彼得洛夫著《反裂》，阜德洛夫著《生路》，波齐涅尔著《辩证唯物论讲话》，莫洛托夫著《向斯大林学习》，等等。由胡明自己编著的包括：《苏联是怎样成长壮大的》，《世界经济地理讲话》，《世界地理讲授新图》，《新哲学社会学解释辞典》，《现代经济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大纲》，《论帝国主义腐朽的本质》，《新民主主义下的价值规律》，《政治经济学学习提纲》，《语言学讲授提纲》，《辩证唯物主义讲授提纲》，《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辩证唯物主义对俄语教学的指导作用》，《论中学俄语教学大纲和教材教法问题》，等等。

物理系

刘世楷（1897—1966）及夫人

1966年8月26日，北师大教师宿舍工一楼，物理系教授刘世楷和夫人走上四楼楼顶。据目击者言，夫人向下望时似有踟蹰，刘先生伸手将夫人推下楼，然后自己纵身跃下，夫妻双双身亡，刘先生时年69岁。据说当时已经在劳改，该日中午回家时情绪愤怒，找出家中人民币剪碎冲入马桶，然后便拉着夫人直登楼顶。儿女当时目击，而且被命令不准收尸。悲剧发生前，已经被批斗抄家，且遭受人格侮辱，被剃“阴阳头”。

刘先生一生刚直不阿，从不计较个人安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他仗义执言，曾遭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威胁恫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但对一些官僚主义作风和大跃进、教育革命中的不实事求是的现象有不同看法，明知提出不同意见的后果，但还要“对国家尽一点愚忠”。这些出自爱国之心的言行，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灭顶之灾。

物理系同仁回忆，刘世楷先生很有老派知识分子风度，非常儒雅。他曾经说过，“学校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他被认为是教学最好的。在中国天文学史方面很有成就。”

刘世楷号仲则，1897年12月生于四川万县。1917—1922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理化部。毕业后曾在安徽、山东、四川、吉林等地任中学教员。1929—1931年，为吉林大学理工学院讲师，创办吉林大学测候所，编辑《气象月刊》。1940—1942年，曾任四川省立石室（今成都重点中学，市立四中）中学校长。1945—1950年，出任四川省气象所所长。编著《四川气候志》，主持发布每月四川天气概况及成都天气概况。1932年起，先后为四川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华西协合大学、沈阳东北工学院、华北大学工学院、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讲授物理学、农业气候学、气象学、天文学、天文学史等课程。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期间，参与天文系的筹建工作并完成该校教学用天文台的建设。

刘世楷 1922 年加入中国天文学会，为 41 个发起人之一，后被选为中国天文学会北京分会理事。

刘先生治学勤奋，虽体弱多病，后来更视力衰退，然几十年间每日工作时间常在 12 个小时以上。生前著述甚多，主要有《普通物理现象解释》、《天文学》、《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略》、《现代天文学年表》、《普通实用天文学》（译自俄文）、《航空天文学》（译自俄文）、《高中物理实验》、《趣味的化学实验法》（译自日文）、《热力学》、《热学》、《普通物理实验》（共 3 册）、《气象学》、《音学》、《中等物理教材》等等。论文有《关于太阳视象的形状和大小由距日远近所引起的问题》、《四川之气候》、《水灾与气象》、《近八十年中国的科学教育》等等。他在 1956 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天球坐标概算法及其应用（提纲）》，是其 1952—1955 年研究工作的总结，提出一种立体天球坐标的简捷算法，并运用此法去设计一种轻便适用的仪器原理。此法对天文教学、航空航海、野外勘探、军事训练等方面均有相当价值。1959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七曜历的起源——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一文，论证了七曜历的起源。1962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的《从天象与降水的相关概推 25 年间中国水旱的趋势》一文，是在整理我国有关水旱与天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研究了日面活动与降水、水旱灾，流彗活动与降水、水旱灾，日行星的活动与降水、水旱灾等的关系，概推了未来 25 年间中国的水旱趋势。

刘先生是忠正耿直的爱国者。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曾经在 1932 年的四川大学学报发表《九一八国难》的文章，义愤填膺地指出：“我们不能不痛悔当局之无能，之无耻”；痛斥国民党“以党治国”，政治腐败；号召学生“随时准备，等到机会一来，马上和敌人拼命”。他积极支持四川大学学生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为抗议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带头签名罢教，还从物质上资助受反动政府迫害的学生，支持他们奔赴解放区。

夫人是家庭主妇。

廖祖青（生年不详—1967）

1967年，大约10月份的某日上午9点前后，在北师大南院物理系低能所所在的物理二楼，一层大厅的铁门上，人们发现物理系年轻教师廖祖青自缢身亡，绳子系在门框上。

廖祖青，广东梅县人。是北师大物理系1964年毕业后留校的年轻教师，出身好，为人温和老实。与大多数同学一样，积极参加文革和造反。他女朋友的母亲在某医院工作，以成分不好（所谓漏网地主）的罪名要被遣返回农村老家。当时廖祖青为群众组织的一个小负责人，遂开了介绍信去该医院，希望对方手下留情，让老人留在北京。结果对方单位向北师大反映（也有说法是当时就把他押送回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严厉斥责，令其负担沉重，哭笑无常，至自杀前精神已近崩溃。

赵亮坚（生年不详—1968）、王蓉（生年不详—1968）夫妇

1968年上半年4月8日，北师大教师宿舍工三楼，人们发现物理系赵亮坚、王蓉夫妇在家中身亡。夫妻二人着装整齐，并肩躺在床上，二人手腕皆用电线缠住并彼此相连，即形成电路串联，分别用连接电线的针头刺入皮肤，电线通向电灯开关。据推测，赵亮坚拉下开关，电流先经过王蓉，再到赵亮坚。

在革委会领导下的“斗批改”运动中，夫妻二人均被张贴大字报，屡遭批斗侮辱，整人者让他们的孩子当面喊打到父母的口号。据说，还将给他们夫妇“办学习班”。

一辆卡车拉走夫妻遗体，许多北师大人目睹。他们的三个儿女一直跟在车子后面奔跑，口中呼声不绝：“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其时，最大的孩子十几岁，小的不足十岁。

赵亮坚，物理系副教授，辅仁毕业生，英语极好，专业亦十分出色，且仪表堂堂，风采出众，令许多学生印象深刻。学生公认，赵亮坚是力学课讲得最好的老师。有学生称赞说，他讲课极为严谨，逻辑清晰，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经常是最后一句话讲完后下课铃

声随之响起，故深为学生敬重。赵亮坚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还是民主党派，又因为毕业于辅仁物理系，被说成是王光美的同学（既非同班亦非同届）、美国特务。

王蓉，物理系办公室主任，来北师大前曾经在清华担任教务工作。据说有台湾社会关系，又有传说是梅贻琦的干女儿。无论真假，这个说法不仅麻烦，而且成为莫大罪名。王蓉容貌美丽，为人泼辣干练，有人说她可以同时处理几件事情而有条不紊。身为办公室主任，亦不免与人有各种冲突，在文革背景下亦成为各种罪名。

赵亮坚生前著有：《物理基本知识》、《热和物态的变化》，与人合编《普通物理学讲义》等等。

祁开智（1906—1969）

1969年3月20日，物理系教授祁开智从被关押的西南楼（一说西北楼）四层跳楼自杀，时年63岁。祁开智的一个主要罪名，是军统小组长。依据是化工大学一位教授的揭发，除此外没有任何其它证据。据说这位教授还揭发了其它人，基本都是老教授。后来他全部推翻了自己的揭发，坦言皆为逼供信的结果。也因此，北师大准备结束对祁开智的审查，但是又唯恐漏掉国民党特务。在定下召开“宽严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专案组几个人找到他，进行最后一轮“攻心战”。如果真的仍然没有结果，准备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宣布结束对他的隔离审查。就在这次谈话之后，祁开智自杀。

祁开智又名祁伯达，1906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县周矶祁家台。南开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1932年获硕士学位。同年12月绕道欧洲回国。先后在安徽、南京、陕西等地高校任教。抗日战争期间，祁开智曾经发誓，不赶走日本侵略军决不蓄发，昭示自己爱国的赤诚之心。在西北农学院任教期间，他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同学校当局面对面抗争。

新中国成立后，祁开智曾经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主任、副教务长等职务。他在经典物理学方面有专门研究，于理论力学和流体力学方面造诣深厚，其论著及研究成果对

我国导弹、卫星运载工具的理论研究卓有贡献。

祁开智的学术成就在民国期间已经为人瞩目。据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准备研制原子弹，蒋介石曾经亲自点名他参与。有北师大同事回忆，1957年10月，苏联宣布卫星上天。那时这还属于极为秘密的事情，基本没有能够看得到的资料。祁开智自己琢磨计算，对同事说，发射地点应该是在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境内某地，因为卫星不会向东，一定是向西飞，需要绕地球两周后才能进入轨道。若干年后，看到了有关资料，果然如此。

杨庆丰（生卒年不详）

1967年前后某日，物理系实验员杨庆丰得知有人揭发他的“问题”并且进行外调，极为紧张恐惧，遂上吊自杀。

据了解情况的人说，杨庆丰的所谓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事情。物理系实验室有气枪，1958年前后除四害前后，杨庆丰用气枪瞄准黑板打枪，有子弹碰到墙上后跳到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上。当时，杨庆丰很快便主动向党组织坦白此事并做自我批评。文革中，此事被重新作为问题揭发出来，更被无限上纲为“用气枪瞄准毛主席像”，云云。

杨庆丰是河北丰润农村人，家庭贫困。他是工农速成学校毕业到师大，成为物理系实验员。

数学系

李竞权（生年不详—1970）

1970年9月14日，北师大派人去领回即将出院的数学系二年级学生李竞权。走到四楼到三楼的拐弯处，李竞权跳了下去。当时李竞权并未死亡，北医三院给师大打电话，问是否抢救，得到肯定后，抢救未果，李竞权于第二天死去。此前，李竞权作为“五一六”

分子被隔离审查，所住小屋的外屋便住着工宣队。一天夜里他试图触电自杀，结果被工宣队的人察觉救过来，因此送到北医三院。

李竞权，1946年农历8月15日出生，贵州人，工人家庭，是出身好的学生。1964年9月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本科学习，共青团员，人很聪明，能力也强。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谭厚兰领导的“学大庆战斗队”成员，并且是负责人之一。曾经去大庆造反，揪斗铁人王进喜，在北京参与揪斗余秋里。1970年，与其他一些文革早期的活跃分子一样，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隔离审查。

化学系

刘桂桓（生年不详—1966）

1966年8月，北师大化学系学生刘桂桓跳楼身亡。迄今，没有人说得清楚他究竟是从哪座楼跳下，也没有人说得清楚具体日期。不过，很多老师和学生记得，地点应该是出版社的楼或者外语楼，时间应该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前后。那时校园里面气氛已经十分紧张，带着高帽子、剃着阴阳头的黑帮每天排着队、喊着“我是黑帮”之类的口号去食堂吃饭。二附中姜培良被打死后，造反派组织群众去参观，大喇叭从早到晚播送各种消息。大家也还记得，自运动开始，这已经是刘桂桓第三次自杀。

刘桂桓，北师大化学系63级学生，来自东北农村家庭，出身中农。刘桂桓一直很上进，是入党积极分子，担任团干部，负责宣传工作。文革开始，系党总支负责人遭到批判，其中包括负责宣传的领导，而且批判调门不断升级。刘桂桓经常出黑板报，也经常写文章。因此觉得自己也犯了错误，是保皇党，因此惶恐不安，压力很大，精神负担沉重。

那时化学系还在辅仁校区，辅导员发现他思想有负担后，马上做他的工作，从正面开导：“你是学生，黑板报什么都是你工作，你没有问题”，等等。但是，在一次晚饭后，

刘桂桓从宿舍楼三层跳下来，因为绳子拦了一下，又跌在柜子上，所以只有一些外伤。师生们马上联系急救车送到医院，得到及时抢救。

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化学系回到“新校区”（即北师大现在的校区）参加运动。那时社会和校园内的运动更加疯狂，师大也已经开始有人自杀。尽管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刘桂桓吃安眠药再次自杀，由于发现及时，得以幸免。此后不久，刘桂桓跳楼。

校党委

程今吾（1908—1970），

1970年5月14日，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今吾病逝。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程今吾已经患病。7月，康生亲自到北师大点名：“程今吾是彭真、陆定一黑帮的亲信”，随即被关入牛棚，陷入无休止的批判斗争，两年内未得到应有的治疗。1968年确诊为直肠癌，手术后躺在病房仍然遭受批斗。

程今吾于1908年8月1日出生于安徽省嘉山县明光镇，原名程蕴璋，曾用名程洁声、程今吾等，1949年后一直用名程今吾。

1927年在家乡教私塾。1929年考入陶行知主办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在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感召下，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自己后来说：“投到陶先生门下一年多时间里，我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现在的想法是要把师范教育办上去，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改造农村的急先锋来。在我们这一代里要把中国人民的素质变个样。陶先生能吃苦，我们难道就吃不了苦？！”1930年晓庄师范被蒋介石查封后，仍然追随陶行知先生，先后由陶先生安排去浙江、广东、广西、安徽各地从事乡村教育工作。他追求进步，向往革命，深受学生的爱戴。他在上课时，大量选用鲁迅的《野草》、高尔基的《海燕》、《我的大学》和《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等课外读物。在他的影响下，像《毁灭》、《铁流》、《士敏土》、《资本论大纲》、《唯物辩证法入门》，成为进步学生争先阅读

的热门书。此外，他还通过学校办的小工厂、小农场以及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引导学生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结合起来。

1938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汉抗战研究会工作，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与组建工作。1941年，应陶行知之召，到重庆陶行知先生主办的重庆育才学校任研究部主任，成为陶行知的得力助手。1942年，端午节将近，一天，育才学校的邻居不慎失火，重庆市国民党当局诬指育才学校失火，要以违禁法令拘捕陶行知。程今吾挺身而出说：“学校的事，陶行知已委托我办，你如要拘捕学校的主人，我去！”大义凛然，无所畏惧。

1944年春到延安，同年9月任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1949年任中央教育部视导司副司长兼部党组秘书。1951年调任中宣部，历任高教处处长等职。1961年参加中央《高教六十条》、《中教五十条》、《小教四十条》等有关文件的制定工作。196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65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师大一些老教师还记得，1962年前后，程今吾初到师大便放了三把火：一是抓学生的基础知识，比如提出文科各系要有基本书目；二是师范大学要抓教师基本功（包括粉笔字、板书等）；三是高校要注重青年教师队伍的培养。这些主张颇受教师们肯定和欢迎，在新中国后高校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令人印象深刻。

程今吾留下的著述有《新教育体系》、《延安一学校》、《工农读写教学的实际经验》、《青年修养》、《程今吾教育文集》等。

教务处

张士弘（生卒年不详）

张士弘是天津人，教务处一般干部，据回忆原来是辅仁工作人员，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后到北师大。文革初期也曾积极投入，很快因家庭历史问题受到冲击，被勒令将办

公桌从办公室挪出到走廊。可能是压力大想不开，人失踪了，直至文革结束，无人知道下落。迄今为止，关于张士弘的最后消息是，有人曾经在1966年11月21、22日前后，在新街口见到他，只是简单问候，感觉得到他情绪低沉。

校医院

闫翠文（女）（生年不详—1966）

闫翠文，校医院妇科医生，于1966年在北师大工三楼家中自缢身亡，具体日期不详。

人们回忆，闫大夫是部队转业到北师大校医院。据说出身不太好，她的工资在校医院是最高的，每个月有120元，经常去莫斯科餐厅吃饭——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人老实，胆子很小。

后勤处

董增波（生卒年不详）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隔离审查期间，北师大后勤处车队司机班班长董增波自缢身亡。

师大女附中

卞仲耘（女）（1916—1966）

1985年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和其它几位校领导，又一次在校园内被学生揪斗侮辱。卞仲耘和其他几位校领导，头上扣着纸篓、高帽，轮番被施加游斗、下跪、抬土、打扫厕所等等折磨，期间不断遭受各种毒打。时间长达三四个小时，打人工具包括带钉子的木棒和板凳腿。几个小时后，卞仲耘晕倒，大小便失禁，被认为装死不老实，头部和身上被用脚踢，随后放到运垃圾的小车上又是几个小时。直到晚上，

才送到医院，终于不治死亡，年50岁。

卞仲耘，1916年生于安徽省无为县。1937年初夏，卞仲耘高中毕业，一边担任小学教师，一边准备考大学。1938，卞仲耘投身抗日宣传。1940年，卞仲耘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次年在那里加入了中共党组织。建国后，卞仲耘于1949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历任学校教导员，副教导主任、主任，校中共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校长。1966年时，由于该校未设校长，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那时，她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十七年，同时是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

王荫桐（生年不详—1969）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一次“政策攻心会”上，领导宣布：将王荫桐拉上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他“揪出来”，指控为历史反革命、特务，成为运动对象，遭遇各种批判斗争。1969年，王荫桐病故。

王荫桐是语文教师，曾经当过傅作义的幕僚，据说肃反时已经挨过整。很有学问，教学水平很高，为教师和学生一致认同。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也很关心。有学生成绩优异，因为家庭困难准备放弃读高中，直接工作。王荫桐劝学生：现在就业，初中文凭帮不了家里多少，还是上完高中好。并且带学生去教务处，将学生的助学金升等。类似事情，他做得平静自然。

周学敏（女）（1921—1968）

1968年9月16日夜，女附中语文教师周学敏在家中自缢，时年47岁。

文革开始，周学敏很快被说成“走资派的大红人”、走资派树立的“白专典型”。几位校领导被批斗时她也要陪斗。1966年的恐怖岁月之后，周学敏依然挣扎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在自杀之前很长一段时期内，她每天到学校去时，随身的挎包里面都装着毛巾、肥皂，每天要向当时唯一在家的女儿告别，交代家事，毛衣在哪里、棉衣在哪里……，显

然，她已经做好了再也不能回家的准备。

据子女回忆，自从卞仲耘校长死后，周学敏老师的精神压力一直很大。她钟爱并倾注心血的语文教学事业不复存在，曾经获得的成就也彻底毁掉。身为中学校长的丈夫被打成走资派、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人物隔离审查，后来又被下放到农村。子女中的三个大学生，原本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学习，此时天各一方，且前途渺茫；一个中学生去了北大荒，身边只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儿。事业迷茫，家庭破碎，失去希望。

周学敏个子不高，皮肤白净，娇小玲珑，是很秀气的知识女性。出身于河北涿州一个兼农兼商的家庭，日本侵华后，父亲带全家来北京谋生，住在复兴门附近。

周学敏并非师范毕业，本来在济南齐鲁大学学护理。婚后几年照顾家庭、养育子女，并未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在复兴门卧佛寺附近一所小学教书并且当了校长。后来到了28中，还在工人夜校教过书，最后来到女附中。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却成为一代名师，在语文教学领域成就突出，尤其作文教学的改革引人注目。周学敏极为敬业，每天改作文的工作量非常大，有慕名前来请教的老师表示惊讶：那么大的作文批改量你怎么完成。当然，周学敏很有天赋，朗诵极富感染力。周老师的学生至今记忆犹新：她坐在讲台边给我们讲解《小石潭记》，娓娓道来，不疾不徐，引人入胜。初中升高中时，许多原来立志学习数理化的学生改选了文科班，她们说，就是受到了周老师的影响。周老师的作文改革，得到了主管教学业务的胡志涛副校长的支持。当时的《人民教育》等刊物曾经发表过好几篇介绍她的文章，以及她撰写的语文教学研究的论文。她所创造的“周学敏教学法”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信件每天几十封，还在政协礼堂上过公开课，络绎不绝的参观学习者令女附中不得不做出限制：每周哪天可以听课……。一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赞扬她的成就。2005年，有人谈到：“周老师是当时我国中学语文教学改革杰出代表，曾经开创出一种全新的以言语技能训练为中心的语文教学模式，……比如作文教学，周老师把学生作文中的问题梳理出来，排成序，配合上相关的选文组成单元，一个单元解

决一个重点问题；虽然还是综合作文，但作文指导、批改、评分、讲评，都突出训练重点，符合训练重点的得高分，非训练重点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这样实际上便形成了以作文技能训练为中心，读写结合，选文服从技能训练的语文教学模式。”

宗传训（生年不详—1969）

英语教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批判斗争之外进劳改队，有病不准去看，1969年故去。具体日期不详。50余岁。

赵炳炎（生年不详—1969）

化学教师。因为参加过“三青团”，成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对象。尽管患有肝病，仍然受命去拆城墙，不准请假。1969年某日，劳动后躺下就再未起来，四天后死亡，死时不到40岁。

胡秀正（女）（生年不详—1968）

化学教师。亲属中有人在文革初期因为成分问题被遣送回乡，胡秀正认为不符合政策，找到有关部门申诉，希望改变亲人处境。可惜此举不仅未能如愿，反而为她引来大祸，沦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对象。1968年8月11日夜里，从宿舍楼三层跳楼自杀，第二天早晨被发现。

胡秀正给学生的印象非常深刻。年轻美丽，皮肤白皙，个子细高挺拔，带白边眼镜。衣着朴素，总是黑、灰、白这样素雅的色调，得体高雅。有学生说，当时觉得林道静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她课讲得很好，清清楚楚，字也好看，化学方程式板书非常漂亮。带学生做化学实验细致认真：什么有危险，怎样操作可燃气体等等。据称胡秀正要求进步，但有一种傲气，在年轻教师中间很突出。

胡秀正已婚，爱人也是中学教师。当时的老师宿舍都是平房，她是从学生宿舍跳下来。

有学生看到她遗体，说：“胡老师面容很安详，只在嘴角有鲜血流出。她一定是不愿意吓着她的学生。”“胡老师是外表文雅内心刚烈的人”。

梁希孔（生卒年不详）

历史教师。军工宣队进校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因为有人揭发家庭出身等问题，梁希孔自缢身亡。他在留下的遗书中说：第一，我身体不好所以自杀，与任何人无关；第二，我房间里面的灯泡是学校的，应该归还；第三，某个学生的学费应当免去。具体死亡时间不详，大约是在1968—1969年。

梁希孔，出身富农，婚后长期两地分居。中等身材，语速中等略慢，嗓音浑厚洪亮，语速不疾不徐，一口标准普通话。他学识渊博，讲课重点极为突出、清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明明白白，极受学生欢迎。为人严肃内向，令人望而生畏。梁希孔老师教学风格突出，效果优异，他的一些学生至今记忆犹新。“初一时梁老师教我们历史，讲课特别生动，如同说书，回去后不用复习就全能记住。”

王永海（生卒年不详）

女附中工友。据称是满清皇族后裔，有残疾，独身。王永海在食堂干活，给人打下手，什么都干。1966年，他40岁时文革爆发，被打成“坏分子”在校园里劳动改造。两年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由于对斗争会的恐惧而出走，从此失踪。

据说，卞仲耘遇难三个多月后，王永海曾去她家里看望。看到四宝（卞的四女儿）走到晒台上，就打招呼。进屋坐下后，很难过的样子。王永海说：“我一直惦念着四宝，一直想来看看四宝，看看你们一家子。因为我被打成了坏分子，天天参加劳动，也不敢来，怕学生看见。……今天我到建筑工程部看亲戚去，先过来看看你们。”¹

¹ 据女附中知情人所说，平反冤假错案时，卞仲耘、周学敏、胡秀正、梁希孔四位老师定为非正常死亡。其他几位老师虽然受到严重迫害，但皆定为因病死亡。除王永海外，都召开了平反会。根据本文“非正常死亡”标准（见注1），亦将王荫桐、宗传训、赵炳炎、王永海收入。正如有教师在谈到王荫桐老师时所说：“如果没有文革，我想他不会这么早

师大二附中

姜培良 （生年不详—1966）

1966年8月25日，关押在牛棚的姜培良，与师大二附中其余两位校领导以及语文教师靳正宇，被该校红卫兵拉到学校的小食堂批斗。除了这几个人，会场周围还跪着被指控为“牛鬼蛇神”的其他教师。有学生回忆，经历连续多次殴打的姜培良此时已经面目全非，且神志不清。红卫兵宣布他们的“罪状”后，再次施暴。打人的工具中有军用皮带，还有带钉子的木棒，一棒下去后带着肉丝下来，现场血肉横飞，很快有被殴打者昏死过去。有红卫兵说他们是装死，用冷水泼在他们头上、脸上，还有人从食堂拿了盐撒在他们身上，姜培良当场被打死。

文革初期，北京市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姜培良作为中学系统的代表出席，期间每天回来看大字报。会议结束后回到学校，马上就开始遭遇批斗。那时有“集中火力，炮轰姜培良”的口号。六月底七月初，被学校集中批斗的牛鬼蛇神有20多人，每天接受批判，劳动改造，四位校领导中姜培良被单独关押。从八月起，红卫兵开始打人，几位校领导是主要对象，姜培良更是重点。同为二附中领导的一个同事曾经说劝姜培良：“先到我农村老家躲一阵，等到运动稳定下来再回来。”姜培良不肯：我不怕，我没有问题。

姜培良是老干部，到二附中任职前为北师大教育系党总支副书记，反右倾时犯错误，据称是“业务至上，专家治学”。60年代遂调到北师大二附中担任党支部书记，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曾经与他共事的教育系老先生回忆，姜培良思想正统，为人正派。有人清楚记得，在顺义农村参加劳动时，他曾经提出为思想改造计，应该“把非劳动时间变成劳动时间”，比如放工时每人背一捆秫秸回去。同在二附中工作并一起担任领导的老教师的深刻印象是，姜培良一贯紧跟中央精神，对共产党极为忠诚。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活

死去的。”

着要见毛主席，死后要见马克思。”他教过的学生记得，他特别要求学生在政治上进步，要求学生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求学生对党毫无保留，要求学生在灵魂中彻底根除私心……。

靳正宇（生年不详—1966）

8月25日的批斗会上，语文教师靳正宇也被抓到台上，因为他写过一些诗，有所谓作风问题。会上有人大喊：“你是姜培良的大红人！”靳正宇被打得肝脏破裂，不能吃东西，吐血，送到积水潭医院，终于不治，几天后死亡。

1965年前后，曾经有个女学生因为思想问题去找他，就在语文教研室。因为谈到很晚，女学生没有回宿舍，靳正宇陪着学生在办公室待了一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文革来临，这件事成为作风问题，是他的一大罪状。靳正宇被打得受不了，曾经去派出所求救，派出所又将他送回学校，继续接受批斗，

靳正宇曾经是海军战士，转业后就读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即到二附中教语文，当班主任。因为在部队军事训练时出意外右臂断了，是木头的假肢，他板书都是用左手。他独身一人住在学校的一间小屋里。他的同事说，他平时不拘小节，为人幽默风趣。离世时，靳正宇只有30来岁。

二、非正常死亡的阶段性

就北京师范大学的实际情况，非正常死亡贯穿十年，在其中的几个时间段相当集中。

第一个阶段是运动初期。文革骤起，来势凶猛，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成为先锋和主力，“革命”的对象包括“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旧思想、旧文化”的各种代表人物，也包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时期的运动，从根本上说是由高层掌握和遥控。具体到师大这样的单位，原有的党政领导系统基本瘫痪且沦为运

动对象，工作组来去匆匆，文革新政权“革委会”尚未产生，因此运动呈现一定程度的“无序”和“自发”色彩，没有明确、稳定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如红卫兵所作所为，并没有自上而下的详细计划部署，各个群众组织都自认为是按照最高领袖的精神和指示“革命”。

这一阶段的非正常死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像北师大这样的高校，各个专业领域的教授们首当其冲，他们的个人经历和专业造诣均成为“原罪”，遂在劫难逃。邱椿、石磐、刘盼遂、刘启戈、刘世楷等等皆为典型。

此阶段非正常死亡的另外一个群体是年轻知识分子，既有学生也有教师。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曾经被视为政治上可靠、积极向上者。孰料运动一来疾风暴雨，经常是从“根正苗红”受组织信任的进步分子瞬间成为打击对象。具体原因不外是曾经支持工作组，或曾经受到被打倒的“当权派”信任等等。政治身份的突然转折是颠覆性的，令他们无法接受。蔡钦山、卢志恒、高尚年、王文宁等等都属此类。

还有一个群体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北师大情况看，“当权派”的死亡与其地位是负相关的。也就是说，北师大校级、系级领导虽然大多受到冲击迫害，但并没有自杀或直接亡命于暴力者。而附中情况则不同，卞仲耘死后，二附中学生就曾经议论：女附中打死卞仲耘，我们也得打死几个。姜培良等人死后，当时北京的中学红卫兵曾准备召开全市大会，二附中的红卫兵通知其余几位牛棚中的校领导，准备参加大会批斗，并且要他们“自带火葬费，每人12元”。这个会议最终没有召开，据说是周恩来压了下来：“如果都打死了，斗批改就没有对象了。”总之，越是接近基层的当权派，生命所受威胁越大，中学红卫兵的暴力直接导致“当权派”死亡，卞仲耘、姜培良即为典型。

第二个阶段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这一文件成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展开的标志。就北京师范大学而言，先是由革委会负责。1968年8月军工宣队进驻师大后，随即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相比文革初期的混乱及施暴对象的集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持续的时间更长，没有明显的

特定对象群体，但打击的范围更广。个人经历（曾经参加某政治组织，如集体加入三青团、国民党等）、职业生涯（新中国成立前曾经担任民国政府职务、在某政府机构服务如警察等等）、出身（生于除贫下中农和工人以外家庭，特别是地主和资本家）、个人表现（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在某次运动中成为整肃对象）等等，都可能是沦为运动对象的原因。这一运动的残酷性丝毫不逊于文革初期，一些侥幸免于66年疯狂的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却终未逃脱。

在这场运动中，北师大亦发生了大量非正常死亡。马特、朱启贤、祁开智、王荫桐、周学敏、宗传训、赵炳炎、胡秀正、梁希孔等等，都因这一运动死于非命。

第三个阶段是清查“五一六”运动。根据目前所见有关文献，高层提出“五一六”问题的时间早过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但实际状况是，诸多单位开展这一运动要晚过后者。根据多人回忆，在北师大，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确晚于清理阶级队伍；而且，两个运动之间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

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对象多样不同，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矛头所向十分确定，在高校主要是造反组织的大小头领或成员。究其根源，在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运动中，北京市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活动。主要是北京一些高校的红卫兵组织，曾经在校园张贴了针对周恩来的大字报，但立即遭到了广大师生的反对。后来一些学生成立了跨校组织“五一六兵团”，人数少，影响小。攻击周恩来与最高领袖当时对运动的设计并不符合，1967年9月8日，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时加写了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毛泽东在1967年7、8、9三个月期间视察大江南北时还曾经讲过：“现在是红卫兵、造反派犯错误的时候了。”

毫无疑问，与其它高校一样，北师大也是清查“五一六”运动的重镇。这一运动不仅集中而且十分惨烈，主要在1970到1971年间，运动的领导者是军工宣队。李竞权、王德一、李永祥、尚文廉、胡万顺、董振波都是因这一运动死亡。

三、非正常死亡的必然与偶然

当整个社会的几亿人口陷入疯狂的大潮之中，个人的力量微乎其微，掌握或者改变自己及他人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死于非命的逝者，可以说都带有一点“必然”的色彩，文革的荒谬与野蛮正在于此。不过，即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一些特殊的事例，值得回味、发人深思。

北师大当时有三所附中，其中除了二附中为新中国成立后建校，师大附中和师大女附中均历史悠久，且与北师大有极深渊源。很长时期内这两所学校不设正校长，学生的毕业证书上都是盖北师大校长的章，如陈垣先生等等。三者同为北京最优秀的学校，在文革期间也同样遭受了严重的伤害，卞仲耘和姜培良被活活打死，已经成为文革的野蛮暴虐的象征。

位于宣武门附近的师大附中（即现在人们常说的“师大一附中”）在三所附校中资格最老，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先行者，培养了大批各个领域的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与其他两所附中同样成为许多共产党和政府高级干部子女云集之地。据了解，在运动初期，学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的班主任被批斗、围攻。然而十年之内，始终没有打死一个人，也没有发生一人自杀身亡。在那个血腥恐怖的时期，堪称“奇迹”。追究其原因，十分复杂，但几乎可以肯定，个别人的“善念”亦功不可没。

赵忠心退休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著名的家庭教育专家。1965年毕业于北师大政教系，分配到师大附中，担任少先队总辅导员、团委副书记，文革期间在师

大附中度过。据他回忆：“当时我是教师代表，我出身好，是红五类。把年轻教师组织起来，每人发一个大棒子，在学校里面维持秩序。打人的主要是初中学生，批斗校领导和老师什么的，我管不了，但可以阻止他们打人。当时我年纪轻，胆子也大，我的说法是：可以批判，不能打人，更不能打死人，打死了我们批判谁去啊？没有批判对象了啊。是反革命也好什么别的也好，该怎么处理要按照政策。你们把他打死算什么？”

“那时校长是老干部，被斗得很厉害。我听说卞仲耘他们被打死后，有天晚上专门去看他，提醒他小心。因为罚跪，他膝盖都伤了，要去医院。红卫兵不许他坐车，也不许坐三轮，是拄着棍子去的。医院不敢给治，我说，你们必须给治，我签字，必须治，这是我们批判对象，你们不治好，我们运动怎么搞？那时，这些被批斗的人到医院都不许写名字，要写“大混蛋”，校长是大混蛋，往下排还有二混蛋、三混蛋……。有两位教师因为被斗自杀，状况极端悲惨。我们马上送去医院，还是抢救过来了。医院也是不敢治，我就说你们必须治，我们要搞运动，这些人都是对象，我们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我还和自杀的人说：别让我们瞧不起你啊，有没有问题看最后审查结果，干嘛要自杀？还有一次，听说学生把书记拖到地下室，要扒衣服，那是个女同志啊，我们马上赶过去阻止。也就是说，你们不能这样干。”

二附中在运动高潮中打死姜培良等三人（除姜、靳二人外，另外一人为学生家长，不是师大人），但之后的历次运动则相对平稳，没有发生更多非正常死亡。一位曾经与姜培良一同经历野蛮虐待，与死亡擦身而过的二附中当年的领导说，“女附中在清队中一直陆陆续续有人死亡，但二附中后来没有。说起来，二附中清队运动时，70到74年，师大派了顾明远先生担任领导；75到79年，是师大数学系王振稼担任书记。所以运动搞得比较平和，没有伤害太多人。”¹

面对必然与偶然，让人想起那句著名的“让枪口抬高一厘米”。

¹这里的时间与顾明远先生本人记录有出入，顾先生记忆是1972年到二附中。1972年1月北师大临汾五七干校撤销，我们都回到北京。工宣队派我到师大二附中去担任革委会主任兼支部书记，算是把我解放了。”（《顾明远教育口述史》，4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四、几点说明

1. 鉴于本调查是个人行为，在持续几年中，除极少例外，没有直接采访逝者亲属。尽管如此，仍不免引起亲属伤痛，特此致歉。

2. 由于相关正式文字资料甚少且极难获得，全文内容大量采用了调查访谈所得。因时间久远，个人记忆误差在所难免，故主要事实以至少三人所述可以相互印证为准。如有任何人指出错处并且给予正确信息，不胜感激。

3. 诸多重要事实无法求证，只能付之阙如。如有任何人提供补充信息，不胜感激。

4. 十年动乱结束后，大部分逝者得到了不同形式的平反及恢复名誉。尽管如此，本文作者以为，对逝者的纪念和对于导致他们失去生命原因的思考不应就此为止。这些非正常死亡已经构成北师大校史不可缺失的部分。

5. 调查过程中，得到北师大诸多前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谨在此深表谢意。■

参考文献

著作

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我们的钱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5年9月。

顾明远：《顾明远教育口述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王炳照：《王炳照口述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田正平：《我的大学 我的同学》，《中国教育口述史》（一）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三联出版社，2013年5月。

《启功全集》（第十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启功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7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

报刊杂志

刘锡庆：《祭奠——怀念几位北师大去世的老师》，《师大周报》，1986.12.13，第2版。

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张彦林：《“我来君家君已逝”——刘盼遂及其师友情》，《文汇读书周报》，2012.7.13。

《刘家先生口述史》（上）（下），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16年2月2日、2月4日。

网文

陈徒手：《50年代北京高校是怎样处理不合格党员的》，2011年12月8日南方报业网。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电子版，<http://www.doc88.com/p-0817231898011.html>）。

王友琴博客：《文革受难者卞仲耘》（增订版）（六）。

<http://bianmurderers.blog.sohu.com/300828198.html> 2014-02-10 05.

王友琴博客：《文革受难者之刘盼遂》，2014.09.30。

和睦鸟：《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来龙去脉》，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029/22/634654_160191521.shtml.

余少波：《笃信真理 刚直不阿——记我的导师石磐教授》。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614/17/12762190_292853042.shtml.

未正式出版物

《“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上）（下），辛子陵主编，百年中国历史真相丛书之二。

涂乃登：《教苑留痕》，教育文集，私人印制，2015年5月。

《“八五 记忆 反思”座谈会发言汇编》，2014年1月4日。

《记忆》108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五），2014年2月15日增刊。

【评论】

董连猛其人其事其诗

安希孟

一、董连猛传略

文革初期造反派，不少是有志有才有为有思想的一代，敢于逆潮而动，不惜肝脑涂地。才华出众，但也有些是看风使舵，赌了一把，或竟至于见风使舵，投机钻营。北师大才子很多。师大三派，造反兵团的人最有才气，正直，有骨气，但是不知变通。其次是海派，又叫乏派（1967年冬天戚本禹接见师大两派，蒲守章急不择言说我们的张梦阳是林杰的乏走狗）。杆儿派，谭厚兰派。有一些人，如陈兰彬、尚文廉、郑云云、武汉、周树志，后来淡出。

文化革命中，北京师范大学一开始就受到中央文革重视，这里奉献了首都五大领袖之一谭厚兰，首都大专院校地派的首领，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的头（第一司令部为保守派）。井冈山战斗团后来发展为井冈山公社。谭厚兰首先揭竿而起，夺得头筹。1967年一月夺权成立革委会，就有了北师大井冈山印刷厂、井冈山图书馆、井冈山校医院、井冈山汽车队。东操场更名为七二七操场。那时放映电影在北饭厅或篮球场，故事片前是新闻新闻片。有一次播毛主席第X次接见红卫兵，纪录片中出现北师大校门口，大家乐得拍巴掌。

北师大二把手董连猛，1965年从甘肃考入北师大外语系。文革伊始，他是一年级学生，所谓造反，也不过是批斗政治辅导员而已。他积极申请入党，接近辅导员杨芝岭，文革伊始又批斗杨芝岭。文史楼某教室，地面上画了一条毒蛇，意思是杨芝岭是美女蛇。1966年八月份，是红八月，骂狗崽子，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按照十六条，学校各系开始选举革委会。一天晚上，外语系开会辩论，竞选革委会筹委会。外语系一年级西北楼417房间，公推董连猛进系革委会筹委会，外语系保守派似乎是红卫兵师下辖第六团。刘树林同

学(后改革命化名“刘军”)上去发言推荐董连猛,但袁公表示反对,云:“1965国庆节,董连猛双手拿了两大把各色汽球,我向他要几个,董硬是一个也不给”。这时会场一片“嘘”声,把他轰了下去。刘公树林政治敏感性强,后来成为世界史博士(英国史)。他对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反复辟的研究极为精到。文革伊始,他敏锐揭发外语系108教室马恩列斯肖像唯独少了斯大林肖像(被大风刮掉),定是系总支应负之责——这与赫秃反斯大林分明并非偶然巧合。

董连猛参加红卫兵师,与工作组走得很近,后又及时上井冈山,成井冈山二把手。井冈山诸元老纷纷败下,王、李、蒲、郑云云、刘兴隆、樊、黄、李失落。1966年10月,刚刚摆脱少数派受压地位的井冈山内部出现裂痕。井冈山元老们,即较早觉悟,较早造反的一些才华横溢的老井冈山战士,与谭厚兰决裂,退出井冈山。这使造反履历表单薄的董氏在井冈山内部有了晋升之阶,跃居师大二把手。

动乱岁月,不仅老百姓,而且万世师表的孔老二也上了百丑图。北师大有一份《讨孔战报》,是珍贵的历史文物。谭厚兰、董连猛曲阜打砸孔家店,是师大的一页。1966年11月30日,曲阜讨孔大会开始。讨孔指挥部副总指挥董连猛宣读通电全国的《彻底打倒“孔家店”、捍卫毛泽东思想十点建议》。董连猛宣布:把牛鬼蛇神押上卡车,游行开始!向孔林进军,火烧孔像,刨平孔坟!装着孔子像的卡车来到孔林西边的小桥上,桥下已燃起熊熊大火。红卫兵高喊口号,把孔子像推进火海,大成殿的巨型匾额“斯义在兹”、“生民未有”……也被扔进了烈火中,同时烧掉的还有在孔府里搜出来的一些字画、书籍、牌匾等文物。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1967年,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连续“揪斗”。北师大批斗过的有罗瑞卿、彭真、余秋里、李雪峰、杨尚昆。批斗彭德怀时,还令其夫人浦安修陪斗。

浦安修当时是北师大政教系主任。在北大,彭德怀被夹在大卡车上游斗。用巨手猛压他的光秃秃头颅的,是外语系的董连猛,井冈山二号人物。

苍黄翻覆的“九七事件”。1967年9月1日,文革“小爬虫”林杰关禁闭,师大革委会率众到红旗杂志社呼天喊地誓死保卫林杰、王力、关锋。9月7日,北师大风向大变,樊、黄、李三个革委会委员宣布推翻革委会,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大家都懵了。井冈山上的铁杆钢杆麦杆粉丝纷纷宣布“即日起退出井冈山”;有的反水,宣布申请加入同一天恢复活动的以王颂平为首的井冈山造反兵团。但是井冈山内部的反对派,即所谓南派,因为问心无愧,却没有退出井冈山。外语系俄三和英四的较早参加井冈山战斗团的人,大概是李庆云、陆家贵、袁道之、刘家钊一帮子人,于9.7下午还扛着井冈山红旗在校园游了一圈儿,以昭告世人,井冈山“旗帜不倒”。我没有张贴声明宣布退出井冈山。董连猛和他的铁杆粉丝们纷纷倒戈易帜,宣布退出革委会麾下的井冈山。董连猛张贴声明,声泪俱下,痛心疾首,说自己上了谭厚兰贼船,现下如梦初醒,要和谭厚兰一刀两断,凭割断愁丝恨缕。

“九七事件”之后,樊、黄、李入监狱吃八两窝头(羁押地在德胜门“提篮桥”)。董连猛每次会议均主持大会。情形照例是:造反兵团上主席台要求发言,几个人占领主席位置,董连猛宣布“散摊”“散伙”。谭厚兰,人称“有保姆的左派”,妇道人家,有限君主,君主立宪,虚君共和,傀儡女王,上听从林杰,下面大权旁落。樊里耀、李五泉、黄家林受冷落。董连猛掌控外语系,手下有红色鱼雷、缚苍龙、钢一连、瓦西里等名称繁多的战斗组织,还有几个散兵游勇人自为战。外语系一年级“瓦西里”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有一张大字报挖苦说,是“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臭龙契卡夫”(有趣,funny)。另外一个名称钢一连,源自林彪井冈山时期的钢一连。钢一连文笔很好。主笔是来自山东贫穷家庭的一个苦孩子。

钢一连除了和兵团作战特别能战斗以外,还越级空投部队在英二年级抓捕反革命分子吴振明。我们年级的人善于斗争,文革改名叫刘军、李闯、丁锋就很自然。吴振明爱读书,

他在书上的读书批注是他的反革命罪证。读书越多越反动，就是打这儿来的。他关于普列汉诺夫的知识，就是反动言论。196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英语系一年级骨干同学在文史楼东阳台开会拼凑材料，定吴君为反革命。这，如果没有学校革命委员会当局批准，如果没有校革委首肯，应该说是断难发生的。

1968年春，京城高校部分造反组织炮打谢富治。然而炮打司令部，并非弹无虚发，刀刀见血，有时弹着点就落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房顶上了。这一次“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的宝押错了，杨余傅被当作“变色龙”揪出，连同1967年秋被揪出（揪，文革特有词汇，揪住人的后衣领把人拎起，这动作今已不见诸罪囚）的王关戚“小爬虫”，共两类动物——人属于动物王国。倒谢积极者为北京高校天派和三军无产阶级造反派，大家同属一窝。

1968年春“倒谢”，史称右倾翻案妖风（迷雾），又叫黑风，一定是黄沙翻滚——你懂的。杨余傅被抓，造反兵团倒谢失败，龟缩工五楼，于是有了井冈山掌权一派四二一攻打包围工五楼一役，比林总包围长春，城里百姓不许出城，一个麻雀也飞不出略显逊色。但井冈山革委会指挥武斗豪气干云，断水断粮断电也不亚于林总。汽车轮胎制作强力弹弓向工五楼窗口发射，我初中学的“弹洞前村壁”如今被坐实。长茅剑戟发出寒光。四二一武斗，董连猛是攻打工五楼武斗前线总指挥，做了动员报告。动员大会上，原武装部长大喊，“踏平工五楼，不要啦”。那个武装部长煽动说他心情很沉重，中午只吃了五个饺子。董连猛弯弓射大楼，亲拉强力弹弓，用石头射向工五楼。玻璃窗户几乎全部破碎。他们对工五楼断水断电断粮，叫“三断”。当时工五楼玻璃窗弹痕累累。造反兵团在工五楼掘地三尺挖井。他们用桌椅板凳堵塞楼梯，逃过一劫。膳食科一位杜姓工人，每天吃饭时殴打脚踹造反兵团的同学，工宣队进校后全校大会点名隔离。夜晚有人值守监视工五楼，防兵团潜逃。凌晨兵团同学（彼时叫战士）逃窜，我责问陈毅文同学为何不把暖气片推下砸死彼们，陈毅文说，“朕于心何忍哉”。我刷地脸红了。

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传出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

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文化革命叫继续革命。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此后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北师大清理阶级队伍，董连猛主持大会，国共斗争继续，几百名牛鬼蛇神烈日晒烤，或倒毙路旁沟渠。中午时分，学生均到大食堂用餐，路边仍有牛鬼蛇神晕倒。后来看到董连猛也落难。当初他并无恻隐之心。清查“五一六”，董连猛埋怨群众，却仍对发动清查的人忠贞不二。只说自己蒙冤，不记得给别人的伤害。清查“五一六”，是无产司令部战略部署也。是文革发动者企图结束混乱的不得已之举。无论天派地派，都是一派。他的诗作，不该充满着文革动乱豪情壮志和对于动乱岁月的无限怀恋。

1969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因为伟大领袖发号召，我们对“五一六”充满刻骨仇恨——我们总是相信群众相信党。让董连猛交待1967年9.2黑会(不是92共识)，那是夏末初秋，天气炎热，大家还穿短袖短裤赤膊上阵，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但有蚊虫饕餮。我们要董连猛交待九二黑会，这压根儿也许就是莫须有的伪命题。大家轮番上阵，让一部分人先吃饭先饱起来，其余的人继续斗，让他铁桶倒豆子。快七点时，连续站了五个小时的董连猛大概头晕目眩，敌不过革命群众的车轮战术，说，“我招了”。工军宣队老王宣布大获全胜，鸣金收兵：“把董连猛押下去”。董连猛甫一出批斗会场，就哇的一声嚎啕大哭，人困马乏的我们，赶快去吃最后的晚“餐”。那天下午，我始终坐在批斗会的最后一排——我这习惯保持了一辈子，开会坐门口，随时开溜。我没有拍桌子打板凳大呼小叫，因为，我于此不在行。

后来给董连猛办学习班，就是隔离审查——这玩意儿拿法制观念无法解释，和劳教制度差不多。这名称很优雅——不信给你办两天学习班试试？我也算董连猛专案组吧？反正看管董连猛，看守监督。我起初也怀疑董连猛有弥天大罪，重案在身，后来越来越觉得我自己曾经和反革命也差不多，就是怀疑过无产阶级司令部，嫌周总理有些儿温和。况且董的

反革命罪状也就那说重不重的几条。每天吃、喝、睡，围攻—交代—散摊，用革委会曾经对付别人的法子对付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时，革委会让牛鬼蛇神太阳下游街示众，有老教授就昏倒在地。这次轮到董连猛自己眩晕了。他也尝到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味道。

当然，董连猛不觉无聊，我倒觉着无聊，成天就是朗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每日看管董连猛像看管猪狗一样，我都烦了。这家伙弄得我们什么书也看不成。还有专职老师濮阳翔给他打饭——他简直就是首长。这分明是董连猛这个坏人给我们办学习班，关我们的禁闭。我特别希望从笼子里得到解放，打心底里念诵：“无产阶级安希孟只有解放动乱分子董连猛，才能最后解放富于同情心的安希孟自己”。有一天，董连猛要喝水，我说咱们到主楼旁开水房去。这样，董连猛就给我放了一次风。

在主楼水房打上凉开水，我意犹未尽，说，我俩坐一会儿。他这才说，“我觉得你人不错，我给你说实话，根本没有‘九二黑会’什么共识，我当时头晕眼花，腿都站乏了，没办法，就招了。”其实我知道，反革命分子都是这样逼出来的——胡风，糊涂了，就疯了。于是我说，这些你完全可以对领导一切的工宣队叔叔说。这事我不说，你自己说。因为我说了不算，还得他说。当然你说也是白说，因为斗争哲学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谁相信虚无呢？言“有”易，言“无”难呀。你又不是道家和佛家。你要是道家和佛家，保准不能统御一切。你那时要汉奸特务交代，也是捉虱子心态，不是吗？

于今思之，“九二黑会”，容或有之。九七之前的黑会，照理，也是天赋人权。不打、不抢、不烧，有何不可？林杰倒台如鸟兽散，开个黑会，惊慌失措，惊弓之鸟，发表牢骚，还不行？可是，一个社群，怎能如此水至清人至察呀！几个娃娃，面临政治局势突然逆转，日薄西山，人命危浅，发牢骚，凑情况，对暗号，表示很不理解，比如二月逆流跟不上战略部署伟大，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终因丧失阶级立场，“被”走出了看管小组。我就被从监押小组清除，被解除“关押”！后来知道，“五一六”组织的确存在过，那是幼稚的被煽动起来的青年学生怀疑周恩来。但是这个组织人数很少，区区一小股武装，而且决不是坏人。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我自己就恨不得能看到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可惜没有

看到。

二、“五一六”疑案是非谈

“‘五一六’集团反革命案”是一个夸大的罪案。它指的是1967年北京一度存在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该团伙曾散发反对周恩来的传单。后来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这个组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认为周恩来旧政府是“又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它和批林批孔批周公异曲同工。毛泽东及“文革派”反对“‘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的行动，“要坚决镇压，立即逮捕”。“五一六”秘密组织散发题为“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传单和标语。1967年9月8日，毛泽东在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加了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在全国清查“五一六”。1970年10月，毛泽东作出批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发起“五一六”组织和清查“五一六”分子，是文革动乱的两个方面军，一体两面，典型的窝里斗，牵扯了全国人民的精力。清查“五一六”，在各地实际上成为清查造反组织和极左派头头的运动，是变相结束动乱，恢复正常生活，遏制造反派的势力。有些造反

动乱人物，至今不知悔悟。自己做了暴政的牺牲品，却为文革动乱扬幡招魂，怀念逝去的岁月。另一方面，“五一六”集团和联动一样，属狂热一翼。但几个青春勃发的青年学生，力必多过剩，怀疑炮打周恩来，是荒唐闹剧一幕。但举万众之力擒拿关押隔离，就过分了。扫扫他们威风，打掉高翘尾羽，剥夺权力，足矣，未必要大呼小叫，断其生存念头。他们皆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战无不胜光辉革命思想的受害者。他们和我们，皆不要只反爬虫不反苍龙。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文革矛头向上整当权派，炮打、火烧那么多人，把青年人的热情撩拨了起来，怀疑或炮打周李陈叶聂徐，原也无可厚非，何以怀疑或非议周就罪不容诛呢？怀疑和怀疑一切，二者间有万里鸿沟吗？究竟是谁煽惑青年人矛头向上炮打司令部呢？既然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里“暗藏”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既然敌人不是明火执仗，需要红卫兵火眼金睛识别鉴定、清查、核对，则揭发这个暗藏司令部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革命小将肩头。两个司令部的人如此亲密无间，何以怀疑某人就竟至身陷囹圄呢？

1967年三月反二月逆流，国务院是旧政府，几位副总理成靶子。我被抽调到社科院和北师大的“中央各部联合调查组”，那是中央文革为渗透到周恩来管辖地盘窃取动向。我被分到财贸口。然而其实没有见到过一张关于他们的大字报。没有任何文字批评过他们。只是有闻必录，但也乏“恶”可陈。就我当时的思想而言，我也是血气方刚，觉得周总理和李先念比较右，多么希望真的能发现有关他们的大字报。我们当时的心态是巴不得捉到虱子，越多越好，可惜没有捉到虱子。

后来我和文革中北外的一位朋友交谈，知道他当时的确和周总理陈毅对抗过。真正的“五一六”成员，还是发起人。他很坦率。不过一番交谈下来，无论如何也不觉得他是坏人，反而可爱。当时青年人热血沸腾，有点冒失，居然批斗陈毅元帅。不过周总理也予以谅解了。据他说，天安门责问周总理的巨幅标语就是他们所为。他说有一次让陈毅作检查。周总理和他们订立君子协定，不许挂“打倒陈毅”的标语，但他们违背中英联合公报似的，突然从人民大会堂二楼垂下“打倒陈毅”的标语。后来批斗陈毅，违反协议，周恩来愤而退场。别人拧住陈毅的胳膊，他也想上去拧一下胳膊，被拍照片。清查他的人说：“铁证

如山”。他灵机一动，狡辩说：“我是不让那人拧陈毅胳膊，想拨开他”。细一看照片，还真那么回事。青年人一腔热血被绑架。

有些造反领袖，至今不知悔悟。自己做了暴政的牺牲品，却依然忠心耿耿，依然仇视对立面。他们忠于文革的策动者陈康江，怀恋王关戚，独对被自己压迫戕害的人，对于自己的过往，没有半点愧疚和歉意。好像只有自己一贯正确，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你捍卫的那条所谓“革命路线”，乃是使万众陷入万劫不复深渊的劫难。《董连猛诗选》（2004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就是这样。这本诗集的最大缺憾，是作者省略了1966年至1970年疯狂年代意气风发意乱情迷四海翻腾风雷激荡岁月得意之作。那时候他狂热追随江青康生王关戚，批斗自己的老师同窗。他在外语系有自己的嫡系部队，颐指气使，山摇地动。外语系抄家，金银首饰玉器珠宝貂皮，被一造反领袖窃为己有。那一定是叱咤风云、小人得志、群魔乱舞、瓦釜雷鸣、沉渣泛起、冤魂遍地。究竟谁是吸血鬼，一目了然，然而却打着解放全人类的旗号。

《董连猛诗集》，2004年人民日报社出版，由于出版时的政治生态，也由于出版社需要或考量，作者照片根本没有文革痕迹，也已经删除了文革大量诗作。前言后语中没有文革韵味，偶有文革情愫。作者在后记中说，在文化革命期间，“我用诗，写下了自己的悲与喜，忧与愁。这些诗，是我那个时代情感的写真，也是对那一段历史侧面的纪实，这些诗饱和着我的心血和泪水，所以我倍加珍惜。”这一段情真意切的表白表明作者没有些许悔意。没有反思，应验了“未经审查的人生没有价值”。反思，就是清夜扪心反躬自问，手拍胸膛良心发现。可惜此诗集大量删除文革心路历程。张恩和为他作序云，文化革命中，“他还诗心不死不时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自己内心的感受用诗的形式记下来。”说这就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愤怒，不是针对祸国殃民者，而是对于试图结束过火动乱的无产司令部发动的抑制造反派而举行的清查的愤怒。

另一位序言作者云，文革爆发，董氏“青年诗人以一种担当国家命运的豪情卷进了这场风暴，并成为注定要写入文革史的人物，那四年多他写下了大量诗词”。作者赞扬那是

血性文字。他赞扬董 1971 年被审查期间的诗文。例如，“从来倜傥非常者，不向天公哭路旁”。意思是在审查中，不告哀乞怜。不过我想，诗作者董氏如果对于文革稍有悔意，自我解剖，痛悔自责，稍有歉疚，敢于责问最高神灵，看到师大井冈山治下无数人蒙受冤屈，国家不幸，人民荼毒，社稷蒙难，那未尝不是极高的精神境界。那将是灵魂的升华，那才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不过，纪念文革，这本诗集极有价值。因为，毕竟，这是北师大文革的一段插曲，一个侧面，保留了一些真相。蚊蝇饕餮，挥汗如雨，我辈在师大文史楼昼夜鏖战。那个“阴谋集团”似乎要让我们坠入万丈深渊。“五一六”兵团，那是一个阴谋集团。当时我还担负看管隔离坐禁闭的董连猛的责任。兵弁呀。那是造反领袖们集体沦落的时代，是结束他们的历史使命的时刻，是给狂热者的我们降解，是结束罪恶和灾祸的举措，是魔鬼的一次自我约束，属于伟大战略部署一类。我们系男女党员老师们阶级阵线分明，革命立场坚定，战士斗志昂扬，一如当初董革委对付兵团、对付老干部老教授牛鬼蛇神。

但不幸，不少人挨批斗低眉顺眼奴态百出，并没有改变其本性于万一，一旦活过来，又飞扬跋扈起来。轮迴，轮流作恶，三十年又一条好汉。我们的过于健忘。那曾经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如今已不再。百姓习惯于抹掉记忆，忘怀苦难。如此乐观的民族，或许是可怕的。《记忆》，就是专治健忘症，或狗血淋头，如邓拓公言。

三、诗言志

文革裹挟，罪不在我。但劫难已过，人人应该思索。你如果仍旧生活在历史的阴影笼罩之下，那是你的不幸。1971 年遭受隔离的人，仍旧痴迷。下面是被隔离者的内心独白，其忧戚悲哀，可想而知。但不应该不知反省，应该念及大卡车上被按住脑袋的彭德怀的感受。迫害与被迫害者的共同遭际系于一人。此诗集对文革的发动者情有独钟，依然怀恋灾难的总发动机。请看他遭遇隔离时的心境：

蝉鸣

(1972. 9. 17)

高洁抱青枝，霜天不惮时。

任尔露阴重，兀自唱狂痴。

风翻叶晦明，彻宇玉蝉声。

整日鸣嘶咧，何时可得停？

1970年12月9日，《诉衷情》云，在学校班已经半年了，“忍昏鸦又噪几声”。昏鸦者，同学也。另有1971年四月五日词句云：“天暗云封，不见清明。最苦冤日，是死是生。人生误我，风雨欺春花叶落”。1971年在被审查期间，有一首诗，不知天下苍生文革苦难，却唯独哭诉自己冤屈。诗人之愤怒不应是出于一己私欲，而应该有社会关切。

八声甘州·望雨

正阴云急雨压城来，封天锁晴明……风雨囚中老矣，念当年鹏举（指谓造反是英气勃发，你鲲鹏展翅，别人却折断双翼），此时风停；叹年来冤事，泪共雨同倾。古今同，相加诬罪，诉哪厢？悲愤激腔膺。朝雷啸，洗余清白，还我人生。

只不知这是怨天尤人，是责问肉食者当道者，还是反躬自责。“朝雷啸”，天公为人间冤狱负责吗？

1971年5月21日，隔离审查关押期间，他作诗自比涸辙之鲋。这似乎是说文革初期他批斗系总支的情形，曰：“批斗台上忆曹植七步诗慨叹因步之：一旱千里赤，涸辙鳊鱼泣。旱魃何其虐，频频风吹急。”

1972年6月10日，他尚在羁押中，作诗云：“南冠君子坐冤重”，“未誓恨天三愿

宏”。“无计冤囚长咨嗟”。还有“宁冤沉海”、“囚室盼怀”等句。

文革群众组织领袖，被倚重的专案组，曾经抄家揪斗他人的人，大都不再坚持昔日的阶级立场。造反派头头大都觉悟到替罪羊和被利用的命运。但也有不少人怀恋光辉岁月，对于运动后期被整肃，仍旧怀恨，却只记恨群众，仍死抱着文革旗帜不丢，深情怀念文革的峥嵘岁月。《辛亥咏怀》（辛亥孟冬，1971，北师大），就充满着文革荒诞呓语，怀旧的豪情壮志和对于动乱岁月的无限向往，跃然纸上。

少年志未羁，鹰鹫任情驰。乘意摩星月，御风游碧帷。遍览中外事，四海入胸渠。披阅古今史，倍崇毛主席。百朝千帝土，千代万雄卑。浮沉海岳事，今朝最奇伟。

何等踌躇满志，不可一世，飞扬跋扈。

文革狂涛，嚣张一时，乱世奸雄，枯木朽株，咸鱼翻身，小人得志，攀爬有招，野心勃勃，跃然纸上。自己的得意建立在无数人痛苦的基础之上。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铿锵得令，我手执钢鞭把你打。文革，恶人横行的时代，业已被中共定性为十年浩劫和动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民不聊生，成就最小最小，损失最大最大。可惜四人帮成替罪羊，毛主席反成元勋、贤明君主。其实，红太阳乃始作俑者，魁首。

这首诗还记述文革初期他们批斗杨芝岭老师的辉煌业绩，说他“心忧主席忧”，就有点儿夸张。文革用语也。就连刘周林邓都揣摩不透领袖的心思呀。但把文革初期牛鬼蛇神说成蛟龙虾蟹，就仍不思悔改。在你，是赤诚之心，刘邓陶贺林周邓又何尝不如此呢。个个奋勇，人人捋拳，个个挽袖，横眉怒目，胡风遭殃，章罗蒙难。

“水急泥沙多，妖狡俗自迷；千年此教训，魄勇须多思。”说文革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然而自身尚且受审查，却还诬指别人是反革命呢。真是念念不忘。自己冤屈，别人挨斗都是活该。文革岁月“或战混蛟龙，或擒虾蟹痞；虽披万处创，笃志不犹豫”。文革揪斗他人，何等壮烈。别人都是蛟龙鱼虾？

然而董对于最高人物忠贞不二，却对老师同学怀恨在心。“用我昔时讎，偏彼恶语隙。闻风即是雨，胁迫又威逼。昔日曾对立，即逢此辈异。今时遭奇难，彼辈化长吏。乘势弄刀笔，随心玩直曲。生风怒目来，行雨扬眉去。酷色河川结，厉声林峦栗。”让红卫兵当替罪羊，另有其人。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个个心向党。“大会小会斗，万人千人批；清晨接暮夜，论战继连续”。你当初斗别人时，不也如此吗？“加我‘贼团’罪，诬身为叛逆。恨身无百口，千口复何益？”不过“五一六”集团罪案，至今没有翻转，因为那是祸国殃民之辈，属于四人帮的御林军。“昼则神恍惚，夜则独悲泣；沉沉不白冤，悒悒诉谁与？泪目顾囚房，莹莹徒四壁；呼天天无言，呼地地不理”。当初你们不也如此对待别人吗？

这首诗作于1971年，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有如此狂热诗章，毫不奇怪。愚昧呀，洋溢着春风得意。但是2004年出版此作，如果加上悔意，表示惋惜大好岁月被抛掷，并向受难者致歉，对于在自己手下吃过苦头的人稍有歉疚，学习毛泽东江青的自我解剖，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就博得谅解。不应有恨，恨同学。不应仍不悔改，动乱情结不加掩饰。不加修凿，就说明作者依然怀念那个疯狂迷乱凯歌猛进岁月的乱世奸雄。唉，四个人的余毒。■

附：

辛亥咏怀

辛亥孟冬，1971年12月，北师大

董连猛

童时离故土，千里随阿姊；黄水白云城，秦关汉塞基。

求学感奋发，重望工农期；十载金城短，风华意盛时。
登峰抚白塔，千峦望中低；击水搏黄浪，大河肋下飞。
少年志未羁，鹰鹗任情驰；乘意摩星月，御风游碧帷。
遍览中外事，四海入胸渠；披阅古今史，倍崇毛主席。
百朝千帝土，千代万雄卑；浮沉海岳事，今朝最奇伟。
奴隶封社稷，陈吴志得遂；穷黎遇救星，我幸逢生机。
爱瞻烈英墓，誓肩革命旗；常存存瑞志，欲继继光为。
诚笃忠领袖，藿葵情不移¹；此怀时跃跃，此志常依依。
我辈皆天骄，轻舟顺水疾；少年方及冠，求造诣京师。
春意日边浓，物英大都奇；朝仰天安门，暮瞻英雄碑。
物壮怀亦阔，恩深情愈偎。古都逾五代，新岁射千辉。
领袖雄宏略，中华多壮举。中南海水怒，冲汉化疾雨。
伟哉大字报，壮矣红兵卫；如潮又似汐，滚滚天河溃。
文化革命起，浪吞封修资²。波冲污沼泥，淘尽神州秽。
挥斥意从容，激扬澄玉宇；挽澜又握流，主席真神力。
鼓角声声催，腔膺热血激；中流当勇赴，逆水不为意。
保卫毛主席，此身何足惜。粉身纵碎骨，事业如光熠；
风浪学游泳，力行主席语，踏涛又破浪，却好励心志。
涛涌连天际，波汹平地立；峰头浪恶险，谷堕流湍急。
水浊何浑浑，澜狂何巨巨；纵横漫九州，顺逆漩千里。
我恃黄犊勇，直前未顾体；劈波复斩浪，奋勇学刚毅。

¹ 藿葵。huò kui，藿与葵，菜名。葵性向日，比喻下对上赤心趋向。《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向之者诚也。窃自比于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实在陛下。”董至死忠于置他于死地的人，却仇恨群众。

² 文革是封建皇权思想大复辟。董连猛却说它“波冲污沼泥，淘尽神州秽”。

乍遇风浪险，间时亦呛气；心忧主席忧，遂壮再接再砺。
或战混蛟龙，或擒虾蟹痞；虽披万处创，笃志不犹豫。
往日区区怀，此时历历迹；忠心因血红，寸志映天碧。

二

事理多蹇乖，人生不坦砥；声言抓“贼团”，平地风暴起。
清理又清查，今日复明日；有司细不察，连我禁囚闭。
用我昔时讎，偏彼恶语隙；闻风即是雨，胁迫又威逼。
昔日曾对立，即逢此辈异；今时遭奇难，彼辈化长吏。
乘势弄刀笔，随心玩直曲；生风怒目来，行雨扬眉去。
酷色河川结，厉声林峦栗：“清查不漏一，漏万也无你。
生死全由我，日今非昔比；心慈不丈夫，手软非君子。”
大会小会斗，万人千人批；清晨接暮夜，论战继连续。
加我“贼团”罪，诬身为叛逆。恨身无百口，千口复何益？
昼则神恍惚，夜则独悲泣；沉沉不白冤，悒悒诉谁与？
泪目顾囚房，莹莹徒四壁；呼天天无言，呼地地不理。
欲望泰山日，巉岩梁父蔽。欲飞无羽翮¹，欲劊无刀锯²；
伤极号悲恸，情摧五内坠；彼苍者何辜，竟遭此毒疫？
昔我立怀时，知途多荆棘；志学先烈勇，水火全无忌。
三载多风涛，一心向日极；或便粗孟浪，终嗤阴阳伎。
耿耿忠怀心，淋淋赤胆汁；清清皎月白，霜月红枫赤。
谁意坐冤诬，壮心空自许；环墙囚洁身，谤罪摧清誉。

¹ 翮，hé，鸟翎的茎，翎管。

² 梁父山，山东，山势险峻，孔子以登梁父喻推行仁道艰难，张衡以“梁父艰”比喻仕途险恶。

身贱志亦鄙，誉残颜辱仪；欲生若畜物，欲死如蝼蚁。
 左右皆陋陋，忧忧与戚戚；忧忧不胜愁，戚戚难终已。
 不堪意烦乱，欲逃梦乡匿；谁知相逼苦，往往还惊悸。
 惊起欲长嗟，又恐彼挑剔；慑前又惧后，生死终无计。
 怆怆不成眠，时时心惕息。昏灯照暗淡，孤影亦侘傺¹。
 门若血盆口，窗如魔目视；幽幽囚室冷，诡诡禁楼噬。
 春雨润芽时，秋风摧叶日；杨花又雪花，寒暑四时易。
 渐渐不知期，但看华韶逝；狰狞铁栅紧，锁我人生翼。

三

百岁犹可数，少年谁再继？我方二十余，正是青春季。
 横祸自天劈，飞灾奇难袭；陷身做楚囚，饱历人间屈。
 囚户蔽何紧，日光不透缕；夏时犹着棉，伏月闷且湿：
 禁室虫亦恶，饕蚊昼舞剧；床边蛛结网，益惹情伤郁²。
 花鹊弄嘲声，黑鸦叫揶揄；时时窗外扰，益惹情伤郁。
 叱咤风云时³，善言曾劝谕：“闲庭信步好，漫目观涛起。
 何必多踊跃，踊跃多阙失”。彼时何慷慨，曾鄙庸人嗤。
 革命为人生，风涛平地立；苟生当若死，志士不为取。
 我步主席路，路艰方向晰；一心不二德，誓身捐大义。
 音响犹回耳，却看今日事；怨冤何沉沉，冤怨何抑抑！
 一日九回肠，经时此气聚；欲冲贯太虚，郁郁结云际。

¹ 侘傺，chà chì，失意的样子。屈原《楚辞·涉江》。

² 这是指他在北师大文史楼隔离审查时的生活状态，须知，专案组的其他人也同样以身饲蚊。蚊虫叮咬是不分好坏人的。

³ 叱咤：chì zhà，怒喝声。骆宾王《为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此处指谓在台上颐指气使嚣张跋扈洋洋自得不可一世时的情景。

化气泻疾雨，滂沱降人域；滔滔湘水涨，滚滚汨罗溢。
或欲化霜雪，飞飘六月絮；千原一色白，兆我奇冤耻。
暑雪怙禾稼，雨亦恐民溺；忧民又忧国，意欲却复止¹。
气既不得舒，又复摧肝肺；肺糜肠欲断，茹屈还吞泪。
白骨一何毒，僧身一何愚！妖兴披饰装，蠢目竟无疑。
大圣三番打，吾愚错护庇；识彼骷髅时，白骨刻有辞²；
此际将何恨，恨心欲噬之；今伏此贼孽，亦快我胸脾。
水急泥沙多，妖狡俗自迷；千年此教训，魄勇须多思。
伤意今朝事，有司太昏迂；右偏复左极，挟逼求无倪。
权器弃随意，高低均所宜；桃僵李也代，所近靡孑遗。
最苦含冤人，仰天独长吁；悲吟黄水怨，声动撼崦嵫。
滚滚大河急，千年浊若泥；激昂多少士，慨叹清无期。
幽怨泻黄水，逝流咽嘘唏；逢时今欲清，拌搅又阿谁？
不白冤情事，天下谁人知？澈清石见日，磊磊我心居。

（《董连猛诗选》，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

1 汨罗江屈原投江，忠心遭忌，窦娥奇冤蒙难，六月飞雪，的确无处不在。但酿造冤案者，董某居其间也。茹耻饮恨，师大多少志士，死于井冈山迫害。

2 骷髅，kū lóu, human skeleton, 干枯的死人骨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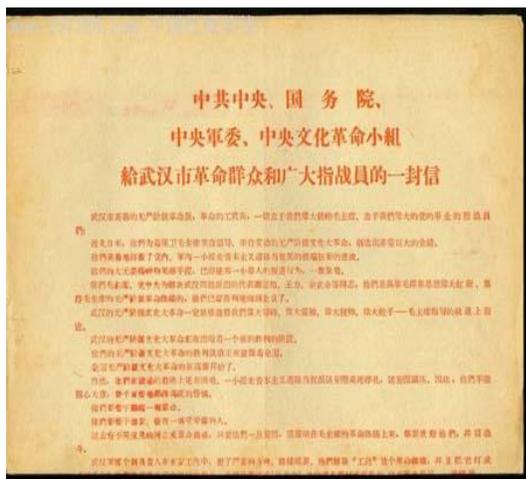
【述 往】

1967年夏天揪“军内一小撮”

岳瑞民

一、武斗开始了

1967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武斗”阶段，几乎每天都有各地红卫兵组织发出“告急”、“惨案”、“流血”、“求救”的消息。特别是7月20日，武汉部分红卫兵组织绑架了中央代表团首长。更为严重的是武汉军区有部分军人也参与其中，而且还携带着真枪实弹。这种“军变”加武斗的形势，威胁到毛主席的安全。



7月20日后，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革委会”，也就是红卫兵组织，上街游行，支持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武汉事件的指示，谴责武汉部分造反派的反革命罪行。北师大当然也参加了。当我们走到西单时，突然天降大雨。人人都淋的像落汤鸡。我们冒雨前进。

刚过了中华门，快要到天安门广场时，突然队伍前边传来领队的命令：全体男生跑步前进！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撒起丫子一路狂奔。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了北京火车站。广场上已经停放着很多大卡车。只听领队说：赶快上车！于是大家急忙爬上大卡车。一长队大卡车载着满满的红卫兵，急速驶到了永定门火车站。卡车还未站稳，领队就喊：上火车！凡是军人一律抓捕！

我和同学们，不，是红卫兵战友们，急速登上火车。只见车厢里没有一个群众乘客，每个车厢里都坐着一些军人。他们一个个呆若木鸡，哭丧着脸，坐着不动。据说他们本来

是携带武器的，在我们赶来之前，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已经缴了他们的枪。我们冲到他们跟前，第一个动作就是撕掉他头上的解放军帽徽和衣服上的解放军领章，接着两人一组负责一个，将他的胳膊拧到身后，扭送到大卡车上。有个别的军人不服，赖在座位上不下车，甚至还有有的要打架。这还了得？！我们几个人一起上，连拉带拽，硬是从窗口塞出去，按到卡车里。时间不长，战斗就结束了。

把这些军人拉回到学校的学生食堂，喝姜汤，吃晚饭。战斗了一天，还真饿了。我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大吃大喝。可是那些抓来的军人，一个个似残兵败将，有的愁眉苦脸，有的哭泣掉泪，也有的脸红脖子粗，气呼呼的不吃饭。驻校的解放军毛泽思想宣传队的首长见状，就问一个梗着脖子不吃饭的军人：你是党员吗？你是干部吗？答：我是党员，排长。他们（指我们红卫兵）把我们当敌人似的抓起来。我想不通！首长说：你是党员干部，就要听党的话，带头吃饭，有问题以后再说！这位干部只好端起碗来吃饭。

据说当天夜里，这些被我们抓来的“俘虏”就被北京卫戍区押到高碑店办“学习班”去了。

实际上，这次抓捕解放军战士的战斗之前，我们已经有过一次“演习”了。好像是1967年的春天吧，北京还冷。有一天，学校革委会用汽车将我们部分红卫兵送到了人民大会堂，说是中央首长接见，召开会议。大会堂里外都有解放军把守。进了大会堂，到了会议厅，才知道不光来了我们学校，很多大学红卫兵也来了。北京各大学的红卫兵一律坐在二楼。不一会，会议厅的一楼就坐满了人。仔细一看，原来是内蒙的红卫兵。他们是对立的两派，都是来北京找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来状告对立派的。所不同的是，其中有一派是由当地的部队战士陪同而来的。为避免冲突，从内蒙来的这两派红卫兵分开坐在两边，中间有通道隔离。

可是这些红卫兵还未坐稳，我就看见一派红卫兵的座席上站起来一个军人，身穿四个兜的军服，可能是个军官吧，大喊一声：我们走！这派红卫兵呼啦一下子就往会场外涌。原来在他们座位上都放着一张纸，是中央关于内蒙文革形势的通告，其中批评了有当地部

队支持的红卫兵组织。

他们哪里能够出去得了大会堂？很快又返回会议厅。返回来后，也不坐下，而是齐声的大喊：我们要见党中央！看到这种情景，我们才知道叫我们来的用意了。于是，北京各大学的红卫兵也齐声喊起来：请安静！等待中央首长接见！

过了一阵子，主席台上的顶灯突然亮了。只见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江青等首长走出来。台下反而更乱了，喊得更起劲了：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这样喊了一阵，好像周恩来总理也生气了，声调严厉的说：我们就是代表毛主席来的！我们就是毛主席派来看望你们的！大家一看总理生气了，于是安静下来，开会。

后来听说，从内蒙陪同一派红卫兵来北京告状的这些军人，当晚就被北京卫戍区武装押送到北京以外的某地办“学习班”去了。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红卫兵造反的矛头便开始指向“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开始掀“军内一小撮”的运动了。

二、受命赴南京掀“军内一小撮”

1. 发《声明》支持“八二七”造反派，谴责南京军区“一小撮”挑动武斗

1967年7月末，物理系革委会派遣我去南京，任务是“调查南京文革形势”。与我同去的还有三位同学，因为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就用他们的籍贯代替吧。一位是湖北同学，任组长，一位是江苏同学。我们三个都是65级同学，平时都认识。还有一位是高年级的，不太熟悉，但知道他是老资格造反派。

我们一行四人坐火车到达南京。因为南京已经发生多次武斗，公交车都停开了，所以从下关火车站只能一路步行。进入南京，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法国梧桐林荫大道。嚯，大路两旁各一行法国梧桐树，树干粗壮，树身高挺，枝繁叶茂，树冠被修整地向马路中间靠

拢，遮天蔽日，马路上几乎不被阳光晒到，全是荫凉。

当天住进了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宿舍。因为一路劳顿，所以虽然似觉身体不适，以为是蚊子骚扰，也未在意。次日早晨醒来，浑身奇痒，一看，天哪，脸上、背部、胸前、腿上、胳膊上，到处都是红包，呈一串串状，原来昨晚我们做了饿极了的臭虫的美餐！

开始“调查”。所谓调查，其实就是到各个大专院校和一些知名的中学去。这里边不仅设有各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宣传站”，还有各派红卫兵组织的“宣传站”和“联络站”。他们都热情地接待我们，介绍自己组织的情况，南京的造反斗争的革命历史和自己组织的光荣发展史，还有武斗的情况，特别是南京军区对待各个红卫兵组织的态度。然后塞给我们大量的油印材料，铅印的也不少。

经过一整天的调查，晚饭后我们就在宿舍讨论分析南京的革命形势。基本上有两点共识：第一，南京的红卫兵组织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一派简称“红总”，另一派简称“八二七”。这两大派都自诩“革命造反派”，指责对方为“保皇派”，而且都控诉对方血腥镇压自己。第二，南京军区似乎支持“红总”派，排斥“八二七”派。两大派都拥有武器，据说是从军区抢来的。但是“八二七”派信誓旦旦地说“红总”的武器明里是他们“抢”的，实际是军区“送”给他们的。

既然我们四人的看法相同，于是就考虑向学校红卫兵总部汇报。这时，老资格同学说：我们应该发一个“声明”，支持南京造反派，揭露军区走资派。组长湖北同学说：我们是来调查的，能公开表态吗？老资格同学说：我负责与学校作战部联系，你写声明。

晚上，老资格同学说，已经与学校红卫兵总部联系好了。湖北同学就拿出他起草的声明叫老资格同学看。老资格同学看后说：这不行，太缺乏战斗力，我来写。他连夜写好了《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红卫兵驻南京联络站关于南京局势的声明》。内容大致是：（1）“八二七”是革命造反派，“红总”是保皇派。（2）南京军区以许世友司令、杜平政委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支持“红总”，武力镇压“八二七”，是南京多起武斗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去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印刷厂印刷《声明》。这个印刷厂，是我们来南京后的当晚，无意中路过，向他们了解情况，刚好他们就是“八二七”派的红卫兵成员。于是，《声明》很快就印刷完成。我们几个就上街，到各个大专院校去张贴、散发。据说一时轰动南京。

过了几天，我校物理系红卫兵作战部长带领一伙红卫兵战友，从芜湖赶过来了。据说那里被保皇派控制，局势紧张，为躲避武斗危险，就转移到南京来了。这位领队是物理系红卫兵作战部长，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他携带有井冈山红卫兵联络站的公章。我们这四个人自然就归他的领导指挥了。

2. 没有亲眼看见武斗

说实话，1967年从7月到9月，南京发上过多次武斗，据说两派都有死人。但是我



连一次武斗也没有亲眼看见。只是有一次看见武斗大军，倒是让人开眼。

大概是7月30日前后的一个傍晚，我们正在街上溜达，突然许多卡车轰轰隆隆的开过来了。卡车很多，一辆接一辆，排成一长串。每辆卡车上都站满了人。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几乎都一样：头

（此照片来自于网上，跟我当年看到的情景很相似。下同）戴工人生产时戴的柳条编织的安全帽，身穿一般工人常穿的那种蓝色劳动布制作的工作服，脚上穿的是翻毛皮鞋，左臂佩戴红卫兵袖章（没看清是哪一派），手里握着用铁管或者三角铁制作的长矛。嗨，一个个精神抖擞，威风凛凛，一脸视死如归的神情。

卡车队伍飞似的驶过。我们知道这是要去参加武斗了，于是赶紧追上去。可惜我们几条腿没有汽车轮子快，不一会就看不见车队的影子了。只好不无遗憾地回去睡觉。第二天，就听说昨晚在下关火车站发生了武斗，而且有死亡。

3. 中途返校汇报南京斗争形势

我的新任务是和化学系的一个女生共同搜集整理资料。这些资料主要就是各红卫兵组织印发的传单和大字报。这些资料大部分是以前的，很多重复，也有新近的。我们把最新的信息整理、摘录出来，汇编在一起。



武斗前期，戴柳冠斗，持棍棒。这是武装示威游行。

8月份，我曾经返校一次，向学校革委会作战部汇报南京的斗争形势和联络站的工作。我提着一大包资料上路了。因为武斗，路上没有公交车，只好步行去火车站。当我走到将近挹江门时，突然一声凄厉的警报声响起，“呜——”，非常惨人。我抬头一看，大街上本来就不多的行人都急慌慌的四散逃跑，一会儿就

不见踪影了。再看城楼上，似乎没有一个人，但是那恐怖的警报声分明是从城楼上发出的。我知道，坏了，赶上要发生武斗了！怎么办？返回联络站？说明自己是个胆小鬼，这太丢人。往前走？小命还要不？犹豫不决。我站在树荫下，仔细观察城门洞口的动静，发现还是有几个人急匆匆的进出。于是，我心一横，牙一咬，硬着头皮闯过去了！

火车上挤满了红卫兵，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多亏我有座位，否则从南京一直站到北京可不是好玩的。火车开动后，我很快发现车上没有卖吃的。肚子饿了，忍着吧。大概到了晚上10点以后，饿得实在难忍。有人说抽烟解饿，可是我不会抽烟，身上也不带烟不带火。没办法，腆着脸向别人借了一支香烟，硬是抽了一半，还真管用，好像不觉得太饿了。

过了午夜，肚子又开始抗议了。这可怎么没办？还真好，这时火车停在了一个小站。火车还未停稳，就看见几只又黑又粗糙的手从车窗口伸进来了。我探头向外看去，好几个人，多是妇女和老人，他们每人都提着一个小篮，小篮里放着苹果、梨、鸡蛋等食物。这些食物装在用细线编织的小网兜里，每个网兜里大概装两三个吧。无论哪种食品，一网兜

卖两角钱。

于是我花了两角钱买了一网兜三个鸡蛋。几口就吃完了。还是饿，但是兜里没有钱，就只好将就吧。旁边的旅客说，这些人都是附近村里的农民，家里实在穷，拿这些农产品卖几个钱，就可以买点粮食或者生活日用品。白天有村干部拦截，碰上就会把东西没收了，他们不敢来，只好在夜里偷偷摸摸的来卖，即使这样也要提防干部在半道上偷袭。

午夜之后黎明之前是人最困的时候。我起来去厕所，怎么觉得屁股上有凉风吹过。走进厕所一看，天，原来裤子的屁股处破了一个大洞！家里穷，1965年我来北京上学时，穿的那条裤子，是我妈妈用她自己穿过的半新的女式裤子（开口在一侧）改做的。因为没换洗的裤子，所以这条裤子很快就磨得快露底了。来南京后，因为天气太热，反正裤子也烂的够呛了，于是我就把两条裤腿剪掉，改成裤衩了。没想到在车座上这么一磨，从裤腿几乎烂到了裤兜，形成一条大口子，所以裤裆里感到漏风。不过幸好我里面穿有小裤衩，要不从南京到北京，真丢死人了！

这次回到学校后，到学校红卫兵作战部汇报南京的情况，把在南京搜集的资料交给作战部。为了说明南京的革命斗争形式，我还绘了一份“军事形势图”。

10年以后，文革结束了。大概是1977年吧，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派了一个老师，找到我的工作单位，调查我们当年在南京的所作所为，特别是谭厚兰有关的罪行。我把我能够记起的情况如实讲了，也说了我只是一个角色，始终没有和谭厚兰接触过，不知道她的事。来调查的老师拿出一张纸，叫我看，说：这是不是你写的？我一看，原来是当年我绘的那张“南京革命形势图”。于是我哈哈笑起来。调查老师说：你笑什么？我说：当年很幼稚很荒唐，还绘制什么“形势图”，俨然以为自己是一个“军事家”呢！■

【述 往】

我参与了北师大的“九七事件”¹

林贤光（清华大学）

1967年的9月，我正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第三动态组（分工负责北京动态，简称“三动”）中担任动态员，也就是每天出去到我联系的一些单位搜集有关单位和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大道消息还是小道消息统统搜集起，带回动态组汇总分析，提供井冈山总部作为形势分析和制定战略的参考。同时，油印出版“动态报”发给基层战斗组和交换到校外阅读。

那时，北京社会上已经明确地分成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北大新北大公社为中心的“天派”（北大反地派，但一般不大参加北航和清华的反地派活动）和以地院东方红和北师大井冈山为核心的“地派”，在社会上互争地盘，互挖墙脚，斗得不可开交。

我在那时是负责文艺院校和一部分社会动态，正在关心当时社会上才出现的“5·16”反周总理现象，涉及到学部以及学部和地派的关系。

8月份，在武汉“7·20”事件之后，一时得意非凡的王力，到了8月下旬与关锋一同被抛出来。随之，经手炮制反军社论的林杰也被揪了出来。这使得天地两派的明争暗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因为，天派这边认为林杰和学部的李广文是地派的“黑后台”。

由于林杰和谭厚兰曾经是同学，而且在文革期间又有紧密的联系，加以林杰的特殊身份（《红旗》杂志社编辑），我们就认定林杰是谭厚兰的后台。1967年8月林杰一被揪出，天派中的许多头面人物就认为：这样一来，师大谭厚兰的“井冈山”必垮。9月初，谭厚兰又以个人名义在中宣部贴出大字报为林杰翻案。更加加重了天派认为谭厚兰在和中央文

¹ 作者说明：本文参考了邱心伟的《清华文革亲历——大事日志》，第261页；聂树人著《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第177页；戴维堤著《逝者如斯》，第87页。

革唱反调。

9月初的几天，“三动”加强了对师大的动态收集。我也到师大去看大字报，不过也只是是一般动态而已，一个苗头就是师大反谭厚兰的“井冈山造反兵团”似乎恢复了活动。

9月5日的晚上，“三动”开会时，就有人传来消息说：“师大革委会造反了”。第二天就有人把师大的大字报抄了回来，是师大的革委会成员樊立跃、黄家林贴出大字报造谭厚兰的反。

9月6日晚上，突然轻工“红鹰”的头头朱成和作战部长王启凤来到“三动”的乙所，问天派的头头会在哪里开？不久，机院的作战部部长轰雷¹和人大三红、体院“兵团”都来了，“三动”的负责人张树有也来了。一起去了“井冈山”团派的总部工字厅后厅，等了一下，无人知道。后来人大说，是否改到北航去开了。赶快打电话去问，果然会议改到北航了，说：赶快大家都到北航去。还说：清华再去几个人。于是，体院、人大等校都开了车去了。清华则由王其林、张树有和我骑了自行车赶到北航去。到北航之后，有人把我们带进了教学区（北航的教学区是禁区，有军队保卫，不是北航的人不能进去），到了一个很大的教室，里面大约坐了有50到60人，围了一个大圆圈，中间是发言的人。蒯大富和韩爱晶都坐在中间。清华“井冈山”除了我们以外，还有管后勤的常燕群。

我们到的时候会议已经开了一半了，记得我进去时是一个女的在讲话。我问了坐在我旁边的北航红旗的作战部长刘德威，才知道发言人是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头头王颂平，他们另一个头头叫铁崇光。另外，师大革委会中造反贴大字报的樊立跃、黄家林和另一个姓李的也在那里。我的印象是，王颂平正在发言，内容好像是对樊立跃他们的造反表示不信任，认为他们和林杰本来就是一伙的。不相信他们是真造反，不愿意和他们合作。而蒯大富和韩爱晶都建议他们两家合作，至少在反对林杰这个共同的目标下联合起来，把明天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大会开好。让樊立跃回去把明天用的广播器材等设备准备好。随后樊立跃等三个人就先走了，这边接着开会。

¹ 编者疑为“洪雷”，电询作者，作者外出，未果。谨此说明。

似乎是一切都已经商量好了。第二天要在师大开“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大会。蒯大富统一了口径，叫做“打倒5·16集团，打倒林杰，师大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口号要喊：“谭厚兰悬崖勒马”，不要喊：“打倒谭厚兰”。这样大会不会被人揪住辫子。又有人提出：“只怕地派来冲会场引起武斗”，于是决定，各校都多去人，纪律一定要好。体院刘长信说：他让运动系的人提前进场保卫主席台。后来不知谁又提出，最好天派集合起来一起进场，这样声势浩大，又可保持良好的纪律。最后，北航刘德威总结了几条：（1）各校尽量多发动人去，（2）遵守纪律，（3）明天早晨都到北航南操场集合一起去师大。而且决定了由清华的鲍长康代表天派发言，由清华拟发言稿，原因是鲍长康在清华9月1日已经对林杰的问题发表过一次影响比较大的讲话，而且派性十足。韩爱晶说：“就让他再表演一次吧”。

记得蒯大富说他也想到师大去，韩爱晶说：“你别露面，留一步，我（指韩自己）认识的人少，在底下转转没什么，你不要去，找个离师大近的地方，设个前线指挥部，有人给你通风报信就行了。”当时。刘德威就提出，把老蒯坐镇的地方设在电影学院，那里离师大近，又是天派的“井冈山”掌权。蒯大富也同意了，在那里当不露面的指挥。

对师大造反团的大会的具体工作也分了工，北航送一面“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大旗，清华为大会作一个横幅，装一辆广播车。参加大会的人数，蒯大富说：“我半小时就可以调动三千人”。韩爱晶说：“北航去两个系”。还说了：今晚一定要通知那些没有参加今晚会的学校明天去参加师大的会。最后又一再问师大的王颂平还需要什么？韩嘱咐王要把明天的发言准备好，把人组织好。那时，北师大的“井冈山造反团”大约不到一百人。

然后，各校分头回去组织力量，蒯大富派车送王颂平回师大去。

散会之后，蒯大富把我们三个人留下，说：明天谁跟我去电影学院？张树有就推荐我，说我去最合适，搞文艺口，和电影学院的“井冈山”也熟。蒯也同意了。进一步分工，张树有负责回去通知其他学校，王其林回去组织人连夜做横幅装广播车，找鲍长康准备发言。蒯大富告诉我，明天一早6点钟在静斋门前上车。

这样我们三个大约半夜1点钟回到学校，我回宿舍睡觉了。

9月7日早晨6点钟，全校的高音喇叭就大声喊叫，组织兵团的人去师大。我则到了静斋和蒯大富坐车去电影学院（新街口豁口外小西天路西），常燕群开了一辆三轮摩托跟在后面。先到了北航的红旗院，时间尚早，蒯就让我 and 常燕群先到师大去看看。我坐了常的摩托就去了师大，从前门进后门出走了一趟。觉得情况很好，“造反团”在大门处摆了签到处，校内大字报很多，几乎都是揪林杰、揪谭厚兰和批判谭厚兰的大字报，还有不少从“井冈山”造反出来要求参加“造反兵团”的表态大字报，而且听到今天早上师大广播台造了反。我看了觉得形势简直好得不得了，赶紧回到北航向蒯和韩汇报。

于是，蒯大富和刘德威带了我和常燕群去到电影学院，我去把电影学院“井冈山”的头头居联贵找出来。居听到蒯和刘来了非常高兴，并说他们立刻装一辆广播车去参加师大的会。

7点多钟，有人从师大来，说：师大有人抓起了谭厚兰，要批斗她，但不知是谁抓的，反正不是“造反兵团”抓的。蒯大富和刘德威听了都急了，说：“抓不得，斗不得”，赶快去看看。于是，刘德威拉上我就赶到师大去，在宿舍找到了“造反兵团”的王颂平。王说：“樊立跃今天早上突然搞了一个‘专政委员会’，把谭厚兰抓了起来，还说这个‘专政委员会’里面有‘造反兵团’参加，但是，我们不承认我们参加了”。我们问：“现在谭厚兰在那里？”王说：“现在谭保护在我的宿舍里”。刘德威说：“赶快放了，否则他们造谣说你们扣了谭厚兰”。于是，王颂平立刻派人去把谭厚兰放了。

在师大操场上正在布置会场，清华的王其林、王文鼎、李国柱都在忙，鲍长康也到了。但大队人马还未到，我又和体院的同学坐了车去看大队走到哪里了。沿途迎上去，在土城附近看到了庞大的队伍正在走过来，几个学校的天派队伍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后来说是有上万人参加。我还说，这一回是个“天派队伍大检阅”。

等到大队伍进了师大，到了操场，韩爱晶、朱成、刘长信等人都到了。韩爱晶看形势很好，就派了北航的车到电影学院把蒯大富也接过来。大会开得很顺利，到中午就结束了。

我有印象，在师大操场上，遇见地质学院的田春林和王大来，他们在找蒯大富。我带了他们去见了蒯和韩，他们一起又到电影学院去谈话了。我未参加，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

当天晚上，我在“三动”就听到了消息。当天下午，北京卫戍区的李钟奇司令员到师大去了，宣布：“开万人大会斗谭厚兰是错误的”，并宣布将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等三人拘留审查。当天，中央文革批评了蒯大富和韩爱晶，不应当颠覆师大的革命委员会。

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北师大的“九七事件”。事后，谭厚兰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重新执掌师大的大权。而“造反兵团”和被关押的樊立跃等人后来的遭遇如何，由于断了联系我就不清楚了。

当时，我对李钟奇在师大宣布的决定有意见，我认为：在师大开万人大会是“造反兵团”恢复活动，这和斗谭厚兰是两回事，不应当扯到一起。

这一次，北京天地两派借着8月底中央文革中王力、关锋被揪出来，穆欣被逐回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社又揪出了林杰，谭厚兰十分被动之际，天派企图颠翻谭厚兰和师大革委会。那一次，派性的大发作是前所未有的，认为时机对天派十分有利，准备一举给地派一个重创。在“九七事件”中，天派是倾了全力投入的，没想到最后还是中央文革说了算，谭厚兰被保了下来。我们这一大批人瞎折腾了一阵，到了最后天派、地派谁也没赢。只有把我们这些人玩弄于手掌之中处于幕后的如来佛一举定音，让我们双方都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走回去。天派想翘尾巴也没翘起来，地派，由于林杰的被揪出，谭厚兰受到重创，尾巴也被割掉了一段。两败俱伤，没有胜利者。■

2016年3月15日

编者说明：此文是林贤光先生所著《我介入了北京的天地派之争》一文的第三节。首发于孙怒涛先生主编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下册，（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2月）。此次发表，作者在文字上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

【述 往】

夜访金永龄

赵惠中

夜访金永龄的故事，发生在1969年冬或1970年春某个周六的晚上。故事中两位主人公都是我的老师。

金永龄是北师大物理系的老前辈。他是物理系1956年—1960年党总支书记，1958年—1965年的系主任。我是1964年考入北师大物理系的，那时他还在系主任的职位上。如果是正常年代，系主任与我们普通的本科生极少交往。但是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打破了往日的格局。运动初期，作为“走资派”与“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双重身份的金永龄就被打倒了。因他是清皇室的后裔，文革中吃尽了苦头。

我淡出文革后无事可做，闲得发慌。1968年初，听说同系65级（3）班蒋锡久同学围棋水平很高。他是棋界老前辈邵福棠先生的高足，曾得过武汉市和湖北省围棋少年冠军和中南局少年围棋第三名。在北大无人是他的对手。因现在也无事可干，于是我就萌发了向他学围棋的念头。经人引见，蒋锡久收下了我这个徒弟，成了我的围棋启蒙老师。在我的带领下，我班郭英伟、蒋汝清、王应虎等同学也跟着蒋锡久学起围棋了。于是西北楼117室变得热闹起来了，大家天天沉浸在黑白世界中，把文革中那些烦心事抛之脑后，全然不顾。

1969年10月18日，林彪发了“一号战备通令”（实际上是疏散令）后，我们北京师大被疏散到北京房山县的东方红炼油厂（简称“东炼”）劳动锻炼。我班的主要任务是到山上开石头与砌公路两旁水沟的石墙。原系主任金永龄老师也随我班“三同”，当时他还戴着“走资派”等一系列帽子，但大家知道这些东西经不起推敲，早晚要推倒重来，所以无人再去折腾他了。从内心来讲，全班同学都十分清楚，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物理界老前

辈，专业方面的造诣很深，对北师大在天文系与物理系内创建核物理专业与低温物理实验室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他又是一个爱才、惜才的好领导。所以，在无他人时，大家偷偷地与他来往，我也算其中之一。那时，我们正热衷于下围棋，听人说金老师是师大的围棋高手，而我们的围棋师傅蒋锡久是“师大无敌手”，我们很想目睹他们两人手谈一局，决个高低，但因当时的政治气氛而不敢造次。因为东炼地处北京远郊，所以每隔两周我们可回学校一次，于是我们想能否利用回城的机会促成“金、蒋大战”！蒋锡久年轻无包袱，一说就通。金老师那边，行吗？要知道这在当时是有风险的。后经我暗中撮合，决定利用回城的机会，在金老师家开战。

我记得那是个周六的晚上，天气很冷。我俩各向系里的老师借了一辆自行车，瞒着其他同学约七点多到金老师家。他家在鼓楼附近，好像是宝纱胡同23号。由于他还住的是原来的房子，我感到他家的房子还是较大的。他见到了我们后，很客气，沏了茶，寒暄几句后就拿出棋具。金老师很客气，说自己已久没下棋，执意要“被让二子”，蒋锡久则坚持自己执黑。结果我记得是蒋锡久中盘胜金老师。其实，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夜访，给逆境中的金老师一丝慰藉，也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忠厚的长者。后来我们还想拜访薛迅副校长，但因新出版的《毛选（第五卷）》上点名批评她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作罢。

此事虽然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文革结束后，金永龄老师又重返政坛，曾任北师大副校长，还兼任过中国大学生围棋协会会长。蒋锡久1972年毕业后曾在湖北省某重点中学任教，退休前是华中科技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也是该校的围棋选修课教师。■

2016.03.06 于上海

【文摘】

文革初期，“三孔”遭遇空前劫难

张海鹏

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并称“三孔”，是人们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象征。因其在中国历史和世界东方文化中的显著地位，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曲阜也被世人尊崇为世界三大圣城之一。千百年来，“三孔”一直受到统治者和民间力量的保护。然而，文革初期，“三孔”却遭遇了一场空前浩劫……

曲阜来了北京红卫兵领袖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即破“四旧”。

1966年8月，破“四旧”的浪潮风起云涌，愈演愈烈，山东曲阜县委和县人委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治下的曲阜县是中国古代文化代表孔子的故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孔庙、孔府、孔林、颜庙、周公庙等一大批文物古迹。按照红卫兵的逻辑，这些都是“四旧”，都在应破之列。

8月下旬，曲阜县委书记李秀先后接到消息，泰安水校和曲阜师范学院的红卫兵要来砸“三孔”。县委立即分头向县直各机关单位及学校布置防范措施，经过全县干部群众的严防死守，红卫兵最终未能冲击到“三孔”。

正当李秀等人暗自庆幸之际，他们绝对想不到，两个多月后，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领袖谭厚兰会离开“文化大革命”的中心，率领一队人马杀向曲阜。

谭厚兰，中共党员，1937年出生于湖南，青年时做过教师，1965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

师范大学政教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与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领导并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

1966年10月上旬,谭厚兰打算到大庆油田去造反,并已派出了一个先遣队到大庆去煽风点火。这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戚本禹和实际负责《红旗》杂志编辑工作的林杰给她出主意,说到山东曲阜去造孔子的反,并且把这一行动与“五四”精神联系起来。谭厚兰欣然同意,立即改变计划,南下曲阜,直捣孔子的老巢。

11月9日,谭厚兰率领200名红卫兵抵达曲阜,住进曲阜师范学院。10日上午,他们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浩浩荡荡直奔曲阜县委,要给县委一个下马威。

曲阜县委早已得知谭厚兰这个“非常人物”到了曲阜,并料到她会带人来县委闹事,所以县委的机关干部为红卫兵的到来准备了一个绝妙的欢迎仪式。当谭厚兰带领红卫兵来到县委时,县委书记李秀、县长高克明和县委副书记张玉美带领200余名机关干部,人手一册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本,在县委门口列队迎接。

高克明代表曲阜县委向北京来的红卫兵表示欢迎。谭厚兰宣读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红卫兵激昂铿锵地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红卫兵的歌声尚未平息,曲阜县的机关干部齐声背诵起“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曲阜县机关干部声音整齐、洪亮,一气呵成背诵整篇文章后,出现了一个静寂的瞬间。这样的场景出乎谭厚兰的意料,红卫兵对机关干部把毛主席著作背诵得如此流畅感到惊讶。红卫兵也不甘示弱,随即又背了一段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接下来,曲阜的机关干部又齐声背诵了《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在整齐划一的声浪中,红卫兵背诵的几条语录被淹没了,于是他们高呼口号,散发《讨孔檄文》。

短暂的交锋之后,谭厚兰提出要到“三孔”去看一看。在县委办公室干部的引导下,红卫兵参观了“三孔”。参观时他们根本不听招呼,完全自由行动。他们在孔府翻出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伪满洲国国旗,又找到一把宝剑和一把东洋刀,这是孔子第77代嫡长孙、袭封32代衍圣公孔德成结婚时韩复榘、孔祥熙送的贺礼。红卫兵还陆续翻出了袁世凯的照片、国民党“剿共”的“清乡册”,孔府与日本侵略军、汉奸汪精卫来往的照片、函件等物品。

如果说谭厚兰在来曲阜之前还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来完成捣毁“孔家店”的任务的话,当她看到这些东西时,便觉得自己拿到了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

推倒国务院的保护石碑

红卫兵抄出国民党党旗后,曲阜县县委、县人委的领导十分紧张。接着,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在曲阜迅速流传——“红卫兵要烧孔府孔庙啦!”县委领导被这个消息吓得坐立不安,决定立即向中央汇报。11月12日凌晨两点,县委接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发来的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留作封建制度、孔家地主的博物馆,像收租院那样。孔坟可以挖掉。”

谭厚兰在11日晚23点就接到了陈伯达的这份指示,比县委早了两个多小时。她马上意识到曲阜县委向中央文革告了她的状,但她又感到欣喜和激动,因为事实证明,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她的。

12日下午,谭厚兰主持召开曲阜各红卫兵组织代表会议,宣告成立“全国红卫兵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谭厚兰不容置疑地获得了“讨孔联络站”的最高指挥权。此后,一系列的讨孔破坏活动都是以这个组织的名义进行的。“讨孔联络站”的成立,结束了曲阜的红卫兵组织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将各个红卫兵组织全部召集在“讨孔联络站”的大旗之下。

11月14日,谭厚兰决定次日召开誓师大会,砸烂国务院命名“三孔”为国家一级文物

保护单位的石碑。当天晚上,在省城济南参加会议的曲阜县委书记李秀得知了这一消息,立即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研究决定,通知高克明、张玉美要尽量做红卫兵的工作,国务院的石碑不能砸,孔子像不能拉倒。

11月15日早晨7点,高克明、张玉美怀着一丝侥幸心理,到驻扎在曲阜师范学院的“讨孔联络站”指挥部去找谭厚兰,他们希望谭厚兰在最后时刻能改变主意。没想到,谭厚兰不仅不听劝,还赤裸裸地威胁说:“我们今天一定要砸烂国务院的保皇碑,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将上报中央文革小组,你们县委要负全责!”

高克明、张玉美见事已至此,双双叹了一口气,只好放弃对谭厚兰的劝说。为何红卫兵和曲阜县委都如此重视国务院的这块石碑?县委将它看作是保护“三孔”最有力的武器,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行动上都是一个巨大的依靠和支撑。而红卫兵要捣毁“孔家店”,这块石碑就像绊脚石,他们认为必须先砸烂这块石碑,捣毁“孔家店”的行动才能名正言顺。

15日上午9点,各路红卫兵在孔府门前集合。砸碑的小分队手持铁锤等候在国务院竖的石碑前,石碑已被套上了粗大的绳索。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11点,红卫兵举行的砸碑誓师大会开始。会上,红卫兵宣读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告山东革命同胞书》、《告全国人民书》,北师大、曲阜师范学院、曲阜一中的红卫兵代表还先后发了言。

北师大红卫兵代表张道英带领全体红卫兵宣读《砸碑誓词》后,宣布:“砸碑开始!”早已准备好的红卫兵砸碑小分队用绳子将国务院立的保护“三孔”的石碑拉倒。手持铁锤的红卫兵马上跳上去叮叮当地乱砸起来,一会儿工夫,花岗岩的石碑就变成了一地碎片。

接着,红卫兵兵分两路,一路冲进孔庙,把孔子像及大成殿内所有塑像的头都砸了下来,除孔子像外,其他塑像全被拉倒。孔子像未被拉倒是因为红卫兵还要游行、火烧。一时间,昔日庄严神圣、金碧辉煌的大成殿尘土飞扬,肮脏不堪。有人从殿内塑像的腹部掏出线装本的《周易》、《尚书》、《礼记》、《论语》、《春秋》。孔子和四配(编者注:旧时以颜渊、子思、曾参、孟轲四人配祀孔子庙)、12贤哲塑像腹中的17套珍版书、17套银五脏和

17个铜护心镜,也从此没了踪迹。另一路红卫兵去了周公庙和孔林,拉倒了周公像,将孔林门上的“至圣林”匾砸碎。

接下来几天,红卫兵砸碑小分队将孔庙、周公庙、孔林里的大部分清代石碑拉倒、砸碎。11月25日,根据讨孔指挥部的部署,红卫兵到孔庙大成殿搬孔子像,拆卸牌匾,准备讨孔大会时游街和火烧。他们想把孔子像整个弄下来,抬出去装在汽车上,没想到弄碎了,后来游街的时候,就把孔子像的脑袋安在了其他塑像的身子上。

镢铤在孔坟上飞舞

1966年11月29日上午,“讨孔联络站”在曲阜师范学院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孔大会。当时的《讨孔战报》第五期描写了这样的情景:“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人们怀着节日前激动的心情等待大会的召开,很多贫下中农清早两点多钟就起身了,附近地区的红卫兵27日晚上出发,步行五六十里,清晨两点多钟就赶到会场……清晨6点钟,大批红卫兵小将和贫下中农排着整齐的队伍,高举着革命造反的红旗,拿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唱着革命歌曲,像一股股红色的铁流,从四面八方,汇集曲阜师范学院,整个曲阜师范学院成了红色的海洋……”

会上,谭厚兰作了总结性发言,讨孔指挥部副总指挥董连猛宣读了通电全国的《彻底打倒“孔家店”、捍卫毛泽东思想十点建议》。北师大红卫兵代表还朗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宣读完毕,锣鼓齐鸣,口号震天。最后,董连猛宣布,向孔林进军,刨平孔坟!

“讨孔联络站”为这次扒坟定下的对象是“上三代下三代”。所谓“上三代”,是指孔子及他的儿子和孙子,“下三代”,是孔林里埋的最后一位衍圣公孔令贻及其父亲孔祥珂和祖父。意思大概是这样就把“孔家店”从头到尾全部捣毁了。孔子墓是孔林的中心所在,东为儿子孔鲤墓,南为其孙孔伋墓,这种墓葬布局意为“携子抱孙”。

红卫兵先在孔子墓前举行了挖墓破土仪式,背诵毛主席语录:“不破不立,不塞不

流……”作为挖坟破土宣言。墓碑早已套好绳索，一阵呐喊，“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墓”巨碑轰然倒地，石碑倒下时正好砸在前面的石头供桌上，石碑一下子断为两截。红卫兵们跳过去，举起铁锤猛砸，石碑成了一堆碎块。如今在孔子墓前看到的碑，就是这些石块粘接在一起的。

孔子、孔鲤、孔伋三个巨大的土冢上站满了红卫兵和农民，镢钎并用，尘土飞扬，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狂热和期待。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坟越挖越深，人们只能看见扔上来的黄土，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从地面向下又挖了三米多深，除了黄土还是黄土。人们渐渐失去了耐心和兴趣。然而，他们仍不甘心，不相信孔子墓中什么都没有，于是打了眼，埋设了炸药和雷管。一声巨响，掀起的黄土铺天盖地，人们冲上去一看，一座空坟！孔鲤和孔伋的墓也都空空如也。

与挖令人失望的孔子墓比起来，挖孔令贻及其父亲、祖父的墓就显得更加惊心动魄了。

11月29日，红卫兵挖开了孔令贻及其父亲孔祥珂墓的封土层，露出墓室石墩。当时天色已晚，红卫兵决定第二天再开棺。11月30日，待开的棺木吸引了更多人涌向孔林。石墩打开，露出了里边的红色棺木，棺木打开，弄出尸体，两座墓中共扒出五具尸体，分别是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妻妾。尸体腐烂的臭味使人们恶心、呕吐，红卫兵将五具尸体就地放了五六天后，弄到孔林东南角一个土堆里烧掉。

红卫兵从这几具棺材中清理出的元宝、翡翠、手镯等随葬品装了满满一箱子。这一箱财宝触动了人们的贪念，以致半个月后，爆发了一次群众性的扒坟狂潮。在赤裸裸的欲望刺激下，他们在孔林里埋锅造饭，几乎把林中的古墓翻了一个底朝天。面积3000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的地下随葬品，基本被洗劫一空。

12月7日，谭厚兰认为打倒孔家店已经基本达到了目的，便率领她的队伍离开曲阜返回北京。讨孔的任务由当地红卫兵继续进行，他们在孔林里办起了农场，把孔庙腰斩为两截，在孔府中办起了阶级教育展览馆，孔府中收藏的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全部被毁坏。

“三孔”在全国破“四旧”运动中的损失最为惨重。红卫兵们捣毁的不仅仅是“孔家店”，更是中华文化的命脉。文革中对“三孔”的破坏，几百年也恢复不了，将成为中华民族永久的伤痛。■

【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1966年6月—12月

（征求意见稿）¹

韦陀

1966年

6月1日 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广播后，谭厚兰（政教系1961级1班的班长，调干生，29岁。此前在《红旗》杂志社实习），与同在《红旗》实习的刘兴隆等三位历史系的同学回到学校，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北师大校党委的大字报。

6月6日 北京新市委派出以孙友渔（一机部副部长）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师大，领导师大文革。

△孙友渔（1915—1998），安徽寿县人。上海交通大学肄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军委三局器材厂技术指导员、通信学校中队长。1940年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任秘密交通。建国后，历任纺织工业部处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局长、副部长（1973.1—1981.5），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常委，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第一届理事长。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在北京病逝。

6月10日 北师大中文系核心组名单：学生12人：闻惠（中五），邓晋涛（中四），唐改奇（中四），苗复泉（中四），孔祥中（中四），王宏泽（中二），单兆正（中三），墨守元（中二），焦先庆（中二），郑云云（中五），柴剑虹（中五），李克臣（中四）。

¹ 因丛立新已有《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非正常死亡调查》一文，本大事记除必要者，不再收录相关资料。

教师五人：李少明、徐建、刘锡庆、刘庆福、石弘。

6月14日 孙友渔给全校做报告，称：革命形势迅猛异常，左派力量占绝对优势……

6月17日晨 教育系学生辅导员蔡钦山，因遭批斗而自杀身亡，18日工作组报告说：“蔡钦山的自杀是叛变行为。戴高帽、罚站、打人是理解的，但对运动发展不利……”

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的社论。社论说：“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然欢迎大字报，拥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是日晨，师大数一(2)的高树奎等十七位同学在北饭厅贴出题为《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工作组进校后就把校党委的干部们集中到主楼办学习班，使之见不到群众，运动冷冷清清云云。这一大字报引发了师生们热烈的响应。物理系64级的赵惠中、李庆林、武世文等五位同学贴出支持高树奎的大字报。上午十时，孙友渔向全校发表“广播讲话”，指责贴大字报的学生“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并强调，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北京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革命。中午，中文系2班的王颂平等同学贴出题为《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晚上，新市委指示，要“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校方随即大抓“反革命”。贴大字报的师生被批判斗争，整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大帽子，并被限制人身自由。赵惠中等五人被打成“现反”，受到多次批斗。

谭厚兰贴出大字报支持工作组。

6月23日 在《红旗》杂志编辑林杰的指使下，谭厚兰反戈一击，与同班的三位同学又贴了一张大字报，转而支持高树奎，反对工作组。为此，谭厚兰被打成反革命。

6月25日左右，物理系工作组在物理楼110室召开批斗李庆林、赵惠中、武世文大

会，会上宣布李庆林等三人为“反动学生”。当晚赵惠中逃出学校，找林杰投诉。林杰问完情况已是凌晨二点左右，曹轶欧用车将赵送到北师大附近。

7月12日左右 曹轶欧到北师大调查工作组镇压反工作组学生的情况。

7月16日晚 曹轶欧与吴德来校，在北饭厅召开了全校大会。吴德代表新市委，宣布孙友渔犯了严重错误，撤销他的北师大工作组组长职务，勒令他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同时宣布刘卓甫取代孙友渔，任工作组组长。

△刘卓甫（1911—1993）河北安国人。1936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同年作为中国篮球队队员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深县县长、八路军一二〇师司令部政治协理员、晋绥贸易总公司副经理、西北农民银行副行长、陕甘宁边区工商厅副厅长。建国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西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商业部、农产品采购部、城市服务部副部长，云南省副省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全国物价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物价总局局长，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顾问，中国价格学会会长。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7月21日 孙友渔做检查。

系核心组领导向各系传达刘卓甫讲话。

7月23日 九时全校大会，重播吴德讲话录音，下午各系讨论孙友渔的检查。

7月27日 继7月25日、26日到北京大学撤销张承先的工作组之后，陈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当晚来到北师大，晚八时在操场上召开全校大会，宣布撤销刘卓甫的工作组。理由是工作组镇压了群众，是文革的绊脚石。康生、江青、陈伯达在会上先后讲话，号召革命师生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受到工作组打击、迫害的师生，在会上揭发和控诉了工作组，受到中央文革诸人的慰问和接见。因给工作组贴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被平反。全校几千名师生万分激动，欢

腾雀跃，不断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因康生在讲话中公开提出要批判“大黑帮程今吾”、“大右派黄药眠”等人，由此掀起批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狂潮。

7月28日、29日 北师大、北大的师生贴出了炮打李雪峰的大字报，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7月29日 北师大的造反派提出要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辩论李雪峰问题，并散发了传单。晚上，穆欣派人去师大劝说：“今天两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都讲了话，中央是信任新市委的。”阻止对李雪峰的批判。

7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8月12日 北大、北师大、北航、清华等院校革命师生召开隆重的欢迎宝书大会。

△八月上中旬 工作组从各校撤出后，北京新市委向各校派出的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顾问等，力图控制运动。陶铸、王任重和新市委要求各校三天之内选出“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并要求各校“立即转入斗黑帮”。新市委在干部问题上继续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路线。各大专院校大办劳改队。在如何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一个要革，一个要保，两派斗争激烈。

8月14日 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专揪5·16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工交口、财贸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

8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社论说：“几十年来，每当我国革命的重要关头，都是因为党和人民群众有毛泽东同志这样天才的舵手掌舵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南，拨开迷雾，端正航向，使我们革命的大船，能够绕过无数的险滩和暗礁，在大风大浪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轨道，胜利前进！”

8月16日 北师大宣布筹委会成立，提出“斗黑帮就是对工作组错误路线的有力批判”。“不要因为批判工作组转移了斗争大力向”。

8月18日 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钢院延安公社等七十六个革命组织发表严正声明，决心与黑匪兵团决一死战，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司令部。

8月20日 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捉拿归案，师大井冈山揪出陈立。

8月21日 师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等组织在石油学院召开批斗余秋里誓师大会，并成立了“揪余火线指挥部”。

8月22日 自从八月五日公开发表毛主席的大字报以来，全国掀起了大批判的高潮。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和转载了一些重要文章社论，如《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揭露和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是日，在师大召开了大批判现场会议，师大师生在会上介绍了经验，最后谢富治和丁国钰对大批判作了指示。

8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指出那些顽固的走资派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作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高度赞扬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的英勇事迹，伟大创举。

△同日，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成立，仅100多人，物理系的郑云云任团长，谭厚兰任政委。多数派在此前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师”，人数达千人。

9月1日 校筹委会提出斗争程今吾。各组讨论。

9月6、7日晚，批斗程今吾。

9月13日 中文系老教师到隋延堂宿舍，听其布置学习。隋延堂，时为中文系四年级学生（1961年入学，因古汉语不及格留级）。文革中，隋以留级是迫害工农子弟为由造反，成为管理老教师的负责人。后因经济问题受到处分。

9月15日 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周恩来在会上发表的讲话稿，均经毛事先审阅。陶铸安排中山大学保守派头目作为中南区代表上天安门讲话，并把“红卫兵”袖章送给刘少奇。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社论引述了毛的指示：“全国人民要向解放军学习。”同时报导，全国各地革命师生，不远千里，一批批来京串连，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交流革命经验。

北工大“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以及首都十几所高等院校召开串连会，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简称“联委会”），以便对谭力夫的发言进行“更深入的批判”。

9月17、23日 晚，批斗程今吾。

9月18日—20日 由江青、陈伯达策划，张春桥主持，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连续四次召开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清华、北师大、地质学院等高等学校的群众组织的代表蒯大富、王大宾等人参加座谈。一致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周恩来是“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一下”，还提出“中央十一中全会并没有领导解决这个问题”，“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张春桥把发言印成材料，由江青上送毛泽东。为即将升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做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9月26日 周恩来参加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全体红卫兵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大会。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申明，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黑材料一律烧掉，所加的反革命帽子取消。谈及工作组问题时，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党的十一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谈到各红卫兵组织时，他说无论少数派、多数

派都是革命的，应一视同仁。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应当平等。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在北师大召开了第一次批判谭力夫“发言”的大会。

10月4日 校筹委会代表刘兴隆检查印发谭立夫发言的错误，井冈山战斗队代表发言。

10月7日 北大、清华、北师大的造反派张贴大字报批判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13日，造反派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第一次批判新市委的大会，会后散发了《告北京市群众书》。

10月14日 北京及外地师生5万多人在北师大召开批判新市委大会。

10月14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大区负责干部及会议各组组长开会。毛泽东讲话，认为会议头一阶段的发言不正常，决定延长会期。

陶鲁笳在邮电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讲话：“多数派里党团员多，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呀！至少说明我们的党团员这种保守落后的思想相当严重。”

北京及外地革命师生五万余人在北师大再次举行大会，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地质东方红、北航红旗、师大井冈山及《北京日报》等单位的群众组织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李雪峰在会上代表新市委作了检查。

10月27日 师大“井冈山”造“工业学大庆”展览的反，理由是展览没有突出毛主席，而是突出刘少奇。刘少奇的照片多，比毛主席的大。没有林彪的照片，尤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继续展览。

10月29日 陈伯达给北师大井冈山写信，支持井冈山造“大庆展览”的反。信中说：“发现石油展览的布置有政治问题是对的，我赞成你们的意见”。“我了解责任不在石油部，而在工交口陶鲁笳同志，要陶检讨。”陈委托余秋里、戚本禹前往说明。戚本禹在讲话中指责展览会的错误是“突出那些制定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陶鲁笳怀有

不可告人的目的。”陶的办公室随即被砸，抢走了部分文件。

戚本禹接见师大“井冈山”代表，对他们27日的造反行动表示支持。

11月初，北大王复兴到北师大找“北师大井冈山兵团”串联，谭厚兰听说北大“红旗兵团”来人了，赶到大操场，站着和王聊了半个小时。她对王说，“我支持聂元梓，咱们是战友。”她后来和新大公社成为对立面，是1967年1月以后的事。

11月8日 在戚本禹、林杰的支持下，谭厚兰率领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二百余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誓师捣毁孔家店。然后开赴山东曲阜。

11月9日至12月7日，以谭厚兰为首的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200多人在曲阜造“孔家店”的反。二十九天中，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刨平孔坟（经陈伯达批准），挖开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共破坏文物6618件），对其曝尸批判。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被专程解押到场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高赞非等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

12月，刘中柱、杨以鸿、孙光启和李观韶四人到北京教学仪器厂，边劳动边休息。刘中柱、杨以鸿对文革持否定态度，但没有表达的机会。依林和涤西的《公开信》给了他们机会。杨以鸿认为，毛主席作为绝对权威已是不可接受的，现在又加一林副主席这个权威，更不可接受。刘中柱、杨以鸿的大字报是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写好后带回学校贴出的，贴了后又返回工厂。

12月17日凌晨三时，谭厚兰派手下人把刘中柱、杨以鸿从工厂揪回学校，关在小红楼，派人看管，同时被看管的还有张传亭和敦进田。当晚井冈山在北饭厅召开了批斗刘中柱、杨以鸿、张传亭、敦进田四人的全校大会。

12月19日 外语系的董连猛把刘中柱、杨以鸿、孙光启和李观韶四人揪到外语系批斗，随后将其押送专政机关。

12月20日、21日 李文博和李世取被抓走。他们在监狱中被关押了半年后，回校在“群众专政”下，强制在校修建队劳改，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才被解除劳改。

12月26日 师大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等组织联合成立了井冈山公社。谭厚兰总负责，社长李五全。筹备委员会解散，红卫兵师垮台，红卫兵师的大批成员加入“井冈山公社”。

12月27日 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北京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江青说：刘少奇的“检讨不成话”，“揪王光美回来，我支持！”当有人提到江青12月18日讲话(毛曾让陈伯达制止贴刘少奇大字报)时，江青说：“那是几个月以前了。你们现在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出来，其它怎么做都可以。”陈伯达、江青与矿院“东方红”座谈。江青在座谈时提议要搞一个红卫兵条例，并对红卫兵进行军训。“红卫兵现在很涣散”。

△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余万人参加的“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戚本禹、穆欣、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先后发言。聂元梓的发言题为《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说：“刘少奇、邓小平从来也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的代表，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

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的谭厚兰在大会发言中，突出地攻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它“充分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全国造反派起而响应，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狂潮。

△东操场改名7·27操场，是因为7月27日这一天的晚上，中央文革在这个操场召集群众大会，撤销了刘卓甫的工作组。谭派以时间命名，以示纪念。■

【读者来信】

1. 岳瑞民读赵惠中文章感想

今日看到一篇文章，刊登在2016年2月29日出版的《记忆》150期北京师范大学文革研究专辑（一），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64级（4）班的赵惠中学长，文章标题是《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文内有这样一段话：“例如物一的岳××与×××在批斗物理系党总支副书记吴碧华时多次猛揪吴碧华的头发不松手，好像对她怀有刻骨的深仇大恨似的。”这里的“岳××”显然指的就是我。

此时惊得我立马出了一身汗！吃惊的是我竟然犯下过如此大逆不道的错误，而且竟然忘记得干干净净！我千思万想，脑子里真的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尽管如此，我仍然丝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即便不是我，也一定有其他人犯过这种错。这篇文章再次唤起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实际上，我至迟在1987年之前，已开始就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对文革运动进行反思了。时间是个销蚀剂。几十年以前的人物姓名和事件细节，有的能够回忆起来，有的就模模糊糊，甚至完全忘记了。为此，我特意在《人民网·强国博客》上开设了我的个人博客《被风化的记忆》。其中2012年7月22日发表的《1966年夏天我担当“牛倌”的日子》，检讨了我的一段往事。在此文发表之前，我经过北师大校办公室和党委办公室，辗转打听到了吴碧华老师的电话号码。在电话里，我向吴老师表示忏悔和道歉。虽然吴老师表示了对我的谅解，但我说：无论当时的大环境如何，我还是有责任的。别人的责任别人承担，自己的责任自己承担。还是各负其责吧。

从1987年至今，我主动地利用各种机会，或者当面，或者通电话，向在文革中曾经受到过我伤害的老师和同学表示忏悔道歉。在这里，我再一次向这些老师和同学表示我诚挚的道歉，并致以问候！

我还要向赵惠中学长表示感谢和敬意。正是有赵惠中学长这样的有识之士，勇于直面

文革，叙述文革经历，揭露文革真相，积极反思文革，批判文革，才会使得我惊出一身汗，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积极主动地去正视并反思自己的文革经历。而且，这些有识之士用活生生的人物、有根有据的事实，向那些未曾参加过文革或者对文革不甚了了的人，揭露了文革反人类的罪恶实质。我要再次重复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人有义务有责任说出历史真相（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

2016年3月19日

2. 赵惠中对胡宗式、陈闯创批评的回应

谢谢阎长贵、胡宗式、陈闯创先生及刘明学长对拙作《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若干错误的指正。文革发动半个世纪了，由于时间久远，时间、地点、表达不十分确切等等肯定不少，手头资料极少，主要凭记忆。说实话，我连自己在1966年“6.20”事件中写的大字报的标题是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你们帮我纠错，我表示欢迎。但有几处还是要商榷的：

(1) 胡宗式先生说：1967年4月，以井冈山造反团为主体猛烈“炮轰谢富治”轰动了北京（《记忆》143期第21页）。此事应当是1968年3月，高校学习班时期。

“炮轰谢富治”是北师大的重大事件之一，当时最高峰时期，北师大的人流量接近十万人次/天。具体时间我是记不清楚了。根据《记忆》143期所载：至于孙蓬一1967年4月12日在北大全校大会上炮打谢富治，称谢是“摘桃派”……（第13页）这里准确的时间是：1967年4月12日。我认为北师大“倒谢”时间应该与北大同步，最多有个相位差，所以就写1967年4月。胡先生说是1968年3月，有何依据？还是北京的“轰谢”像上海“炮打张春桥”一样发生过两次？我特别希望王颂平等兵团人士以及当年“轰谢”的“炮手们”能发声。

(2) 胡先生说：谭参与组建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第87页）。应当是第一司令部。我查了一下，说“谭参与组建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是蔡鸣乔文章中提到的。在我的记忆中，红卫兵师参加的是一司，井冈山参加的是二司。与蔡鸣乔的叙述吻合。

(3) 陈先生说：伊林·涤西致林彪的公开信写于 1966 年 12 月 15 日，并总结说，信中要点之一是批评林彪的毛泽东思想顶峰论（第 11 页）。此说时间有误，且内容不确。这封信是 11 月 15 日写出并发表的，信中并未批评林彪所提“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对于伊林·涤西大字报的日期是 1966 年 11 月 15 日的说法我也看到过，但我觉得与“十二月黑风”的提法有冲突，为此特意打电话给刘中柱。他确认他们的大字报是 12 月 16 日贴出的，是紧跟在伊林·涤西大字报后贴出的。所以我把它定在 1966 年 12 月 15 日。这可能有误。

(4) 陈先生说：“12 月 16 日晨，北师大同时出现了两封给林彪的公开信”，作者分别是中文系的向东彪、林锋和物理系的刘中柱、杨以鸿，刘、杨大字报的标题是《林副主席也是可以批评的》。两张大字报都批评林彪的顶峰论，随后物理系的李文博与数学系的李世取（黑牛）公开支持。（第 12 页第 1 段）。12 月 17 日，上述四人在全校大会上被批斗，19 日又在外语系批斗一次，后押送专政机关；20 日、21 日，又相继把李文博和李世取抓走了（第 13 页第 2 段）。经查，上述时间、标题、内容都有问题。

根据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主办的《井冈山》1966 年 12 月 19 日刊登的《坚决打退反革命逆流》、《致“想不通者”》和《我团召开斗争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该校林锋、向东彪 12 月 9 日贴出《也致林彪同志一封公开信》，12 月 11 日刘中柱与杨以鸿贴出《林彪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12 月 18 日黑牛贴出《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想法》。12 月 16 日，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在北饭厅开会批斗李文博、向东彪、林锋、刘中柱、杨以鸿。在 12 月 19 日之前，这五个人再加上李世取就被公安带走了。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了刘、杨的大字报，但把作者名称和学校误写为“清华大学物理系 刘中桓 杨川昭”。大字报里并没有批评林彪的顶峰论，而是说对林彪是可以批评的，伊林·涤西的公开信是革命行动，另外赞同伊林·涤西对林彪 9.15 讲话的批评。至于李文博，他是在 1966 年 10 月 17 日就贴出著名的《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但内容和批林彪无关（按：类似的时间和内容错误也出现在本期赵惠中

《怀念“插班生”杨以鸿》第61页，把刘、杨12月11日大字报误作12月17日发表，同样误以为这篇大字报是在批评顶峰论）。

从陈先生的话中获悉，他手中有当年的北师大《井冈山》小报，并且能查到刘中柱、杨以鸿大字报的原文，这很好！希望《记忆》能为我们搭座桥，请陈先生把这些资料转发给我。我这次写此文，缺的就是资料。因为我觉得有人故意歪曲文革真相，把文革的所有责任推给“红卫兵”，对文革的发动者却高唱赞歌，就在2009年就萌生了以杨以鸿为原型写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念头。但因自己文笔是弱项，只能聘请高手。请的高手是电视连续剧《刘少奇过渭水》的编剧郭文涛先生。文涛是北师大教育系64级的，他欣然接受我的邀请。我们联系上了刘中柱，他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文涛还拜访了杨以鸿夫人张梅英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文涛给这部电视连续剧起名为《生死追求》，并写了第一集。后来因其他原因而中止了写作（详见“北师大8644新浪博客”）。这次写拙文时，我与刘中柱皆因电脑系统重装丢失了这些资料，而文涛去海南过冬，资料在天津的电脑中无法取出来。只能请刘中柱重写了概况。我文章中的主要内容，都是刘中柱重新资料内的原话，应该不会有误。刘中柱说大字报底稿在同班同学××处，但因这位同学身体欠佳，一时找不到。最近获悉此同学不幸于今年1月15日与世长逝了，大字报原稿是彻底找不到了。如果能从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找到刘中柱、杨以鸿的大字报绝对是件大好事，恳请陈先生一定帮忙。现在郭文涛已经回到天津，把2009年刘中柱提供的资料从电脑中取出来并发给了我与刘中柱，我们准备整理后会撰写有关文章发给《记忆》的。

我们掌握的日期与内容和陈先生说的对不上号，至于谁对谁错，只能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了。1988年7月1日北师大出版的《师大周报》，是专为纪念杨以鸿而发的，整整四版就登了纪念杨以鸿的长文《生为追求 死于追求》。在第三版上写道：1966年12月17日，正在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读本科三年级的杨以鸿和一位叫刘中柱的同班同学，在校园里张贴出来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是：“林副主席也是可以批评的——给林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文中的主要内容，是要同“壮志坚信马列”的“林副主席”，对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讨论一下“顶峰论”问题。文中认为，无论是从社会科学还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事物总是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当然也是要不发展的。把毛泽东思想誉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顶峰”，岂不是要窒息毛泽东思想，使其不再有所发展。怎么能说他们没有批评林彪的“顶峰论”呢？

(5) 陈先生说：提到“杨以鸿 1980 年考取首届 OUSPEA, 1984 年以优异成绩在犹太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亦见于本期赵惠中《怀念“插班生”杨以鸿》第 63 页）。“OUSPEA”应为“CUSPEA”，全称 China-U. 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中美联合招收物理研究生项目），“犹太大学”应为“犹他大学”，即 University of Utah，杨是 1979 年考取 1979 年 CUSPEA 试点第二批项目，比 1980 年的首届 CUSPEA 正式项目还要早（参见吴塘、柳怀祖编《CUSPEA 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 版，第 187 页，第 21 页第 2 段）。

同样，说“杨以鸿 1980 年考取首届 OUSPEA, 1984 年以优异成绩在犹太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依据，来自于这期《师大周报》头版物理系主任杨展如教授在杨以鸿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把 CUSPEA 写成 OUSPEA，是报纸上不清楚所致。据刘中柱说，杨以鸿是 1979 年 12 月参加了 CUSPEA 考试，1980 年赴美入学。说他是 1979 年或 1980 年考取都可以。就像我们是 7 月参加高考，8 月收到录取通知书，9 月入学。说 7 月、8 月甚至 9 月考取大学的人都有，讲 7 月、8 月的两者皆可，就是说 9 月的有点欠缺，但也未尝不可。■

2016. 03. 23

3. 宋翔雁、刘昭明来信

匆匆看过《记忆》152 期目录、俞小平的文章和张从先生的建议及《记忆》对张先生质疑的回复。即使是匆匆看过，也感触颇多。此处只简谈两点：

(1) 俞文结尾引用陆小宝《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一书中提到的：“为历史，为后代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陆的书我未曾拜读过，在此

不便妄言，就回忆文革历史而言，俞文的这一观点我基本认同。但就个人而言，要想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绝非易事。因即使在同一事件中，因不同的人所处的地位、所担当的角色不同，各自的视角和关注点有异，所得出的史实结论就会千差万别。但这不等于说就不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史实了。而是说，面对不同的人针对同一件事写出了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史实”时，切不可轻言唯有我书写的才是真实的。需要告诫自己，我们每个人所提供的历史回忆，只是还原真实历史的史料之一，甚至只是沧海之一粟罢了。真实的历史，是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历经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梳理、研究、考证之后方能写成的，绝不是将众人的回忆文章汇集成书，就是大功告成。不知此浅见能否为参与回忆文革历史的人们所接受和参考。

与此同时，我还想就俞文做一点补充：我们不仅应当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而且应当留下个人真实的感受。感受最好能既包括当时的，也就是历史的感受；而且还包括现在的、经过深切反思之后的感受。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经过个人深刻反思后的感受，可能会更客观，更接近历史真实。只有这样书写出来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的历史，才能让读史人感同身受。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后人更警醒并抵制文革鼓噪者们的各种谬误言论和意图。

(2) 看了张从先生的质疑和建议，以及《记忆》的回应之后，我想谈两点看法：①为了抢救文革历史，我们不仅需要《记忆》这类能够刊登各界人士书写自己亲历文革期间各类回忆文章的宝贵平台，同时，我们更需要支持、爱护、关心这一平台的建设和发展。但应当看到，文革参与者之众多，经历、现状千差万别，加之文革灾难给人们心灵创伤之差异，使参与者们至今仍很难心平气和地探讨过去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纷争。这就给办好这一平台，尽力满足不同观点人群在上面发声，平添了很大难度。为此，我建议每位投稿人都能把《记忆》这类刊物视为一座海纳百川的公共平台，要允许每个人把自己参与或听闻的史实和当时的看法及现在的评述，心平气和地写出来。目的是让他人了解当时的情况提供必要的参考。若对他人提出的相关史实和评述有补充、有质疑，甚至有针锋相对的看法时，应当心平气和地提出，不宜简单地否定他人的回忆，更不宜生硬地批判。因为每个文

革亲历者都有从自己的视角来书写和发表个人参与和了解的文革的权利，别人也应当尊重他的这一权利。更重要的是，我们现今的首要任务是抢救文革历史，而非评判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参与到派性争斗中各方的谁是谁非。同时应当相信，随着历史真相的逐渐披露，随着参与者们反思深度的加深，对派性争斗的深层次原因也会渐次取得共识。②我赞赏《记忆》对来自文革参与者对所刊出文章的质疑、批评所作出的回应。在面对批评和建议时，你们“将高悬鞭策以自警，为促进文革研究戮力前行”的态度，使我深信你们的刊物必将会越办越好，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喜爱、关注和尊重。

此外，我还想补充一点。好像俞文中提到或引述了一句话，即“真是比正确更重要”（恕我不再去查对）。对此，我以为人们在书写历史，发表观点时，对真实和正确这两方面是应当尽可能兼顾的。若把二者隔裂开来有所侧重，甚至对立起来，则会引起偏颇。因为，真实的东西（无论是事物或是观点）并非都是正确的。但只有以真实为基础，人们才能辨清是与非。或可以说，真实是辨清是非的基础。

上述浅见仅供参考。■

2016. 4. 2.

4. 庄菁瑞有感

本期刊尾《记忆》编辑部的回答很给力。面对这样的质疑必须认真对待，提出自己的看法，表明自己的态度。导读对我来说很有用，就如《记忆》的解释，我就是把它当作贵刊编者的态度来看的。另外，我对“垂范”的理解，就是为他人做出表率，做个样板，没有高低之分，只示区别之意。■

2016-4-1

5. 黄孝华赐函

152期《记忆》，其中不少内容反映了我经历的文革实践，读来倍感亲切与苦涩。《记

忆》不断在发掘史实，将是留给后人的宝贵历史遗产。祝《记忆》越办越好。■

2016-4-1

6. 薛雪莱询问为什么看不到工、军宣队的回忆或访谈

军宣队、工宣队在高校文革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自1968年下半年到文革结束，这两个“队”，尤其是要“永远占领教育阵地工宣队”，在高校的文革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在文革研究中，这是一大空白。比如，我们只知道派往北师大的军宣队叫孙副政委、曾参谋，工宣队有个王强队长，他们的姓名、年纪、性别、职务/工种、来自哪个单位等信息，在大家的回忆录中十分罕见。希望贵刊联系那些知道线索者，请他们提供相关信息，以便到其所在的厂矿，寻其人，进行采访，积累资料。■

7. 孙沛东谈王爱和与她的无名画社

拜读最新一期刊物，我发现本期发表的王爱和教授的大作《无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艺术和团体无名》与陆凌先生的《一九六零年——大饥荒对中国人口与社会的影响》，文中引文都有清晰的出处，这非常好。尽管《记忆》自我定位为“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但实际上，学界我认识的很多研究者也很关注贵刊，并且每期必读；我读过的很多中外文文革研究论文，以贵刊论文作为引文出处的不胜枚举；而且，就我本人而言，因为给复旦大学本科生开设选修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我会将贵刊中的相关内容转发给学生作为阅读内容。上个月所讲授的“文革道歉”专题，贵刊所做的北师大女附中选题，更是这次专题的必读内容。因为，我认为参照学界学术规范著文发文，对于贵刊的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会是一个良好的学术训练的导引。谢谢！■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记忆》的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姜文而

本期校对：霍 武